



德州学院
DEZHOU UNIVERSITY

高教 发展 资讯



2026年第4期（总第40期）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发展规划处 编印
2026年9月9日



高教发展资讯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2026 年第 4 期（总第 40 期）

主办：发展规划处

本 期 目 录

1. 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高校分类改革发展	1
2. 高校分类评价的起点、挑战与路径	11
3. 高校办学定位知识统一性的表征与实践规制	27
4. 应用型大学需三大系统性“重塑”	44
5. 应用型大学应破除四大“惯习”	47
6.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	50
7. 闯出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的特色之路	55
8. 应用型高校“双优”工程背景下校企党建融合的时代要求与路径创新 ..	60
9. “双优”工程：应用型大学面对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66
10. 共生理论视域下产业工程师培养路径探索	85
11. 产教融合赋能普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运行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 ...	96



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高校分类改革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管培俊

摘 要: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议程。从历史、学术、社会三重逻辑看,分类发展是高等教育演进的基本轨迹,知识形态分化决定了高校分类改革发展的合理性依据,教育的三重属性要求以分类发展满足国家战略与人民期盼。须以系统思维推进高校分类改革,确立高校分类体系、改革高校评价体系、健全高校激励体系、强化高校监管体系、营造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助推高校分类改革发展落地见效。

关键词: 高校分类改革; 分类发展; 系统思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按下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快进键。“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作为综合改革的着力点,进入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议程,成为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坚定的行动方案。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这一议题对于高等教育战线更具现实意义。

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三重逻辑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战略高度,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综合改革”基于全面创新的本质与教育的规律性,强调改革目标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分类改革”基于教育的复杂性、高校的差异性,强调改革举措的靶向性与服务强国建设的贡献度。战略上突出“综合”,聚焦强国目标,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策略上坚持“分类”,抓住关键问题,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从历史逻辑看,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是高等教育体系演进和功能拓展的基本轨迹。无论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还是



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经验，都充分表明，高等教育机构与体系并非单一模式，也非固定模式，而是在适应社会需要，逐步拓展功能，不断分化、渐次分蘖，各展其长、与时俱进中逐步走向成熟，实现体系完善和功能优化，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回望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高校分类发展问题贯穿始终。1952 年院系调整，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以行业分工为依托的高校分类格局。1977 年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恢复调整，逐步走向以学科发展为主线的高校多样化发展格局。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分层定位、分类发展、合理分工、办出特色，系统性探索高教管理体制变革。1998 年开始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显著特点的高教体制改革，逐步形成条块结合、两级管理、省级统筹为主的高校办学体制与管

理体制新格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高校分类发展进一步成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优先议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强调要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我国高校分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与政策框架逐步成型。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类发展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普遍选择。美国形成了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院校、社区学院多元并存，公立私立双轨运行、分层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由大学、大学学院、延续教育学院等多类院校共同构成；德国形成了大学（综合、工业、师范大学等）、



应用科学大学、职业学院并行的高教体系；法国形成了大学校与综合性大学并存、功能各有侧重的办学布局；日本形成了由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构成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尽管各国发展路径不同、体系结构各异，但都体现了高校分类发展与整体水平提升的共同取向。同时也要看到，高校分类与分等之间的张力具有全球普遍性。

从学术逻辑看，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符合知识体系演进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基本职能所依托的知识形态本身具有内在分化的特征。从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中华文化都有知行合一、明分使群、百工专精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理论对于我们理解行业产业、科学劳动组织，高校分类与社会生产生活的适配性，乃至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知识并非均质单一，

而是包括以求真为核心的理论知识、与行动和判断相关的实践知识，以及面向制作与操作的技艺知识。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用。要使这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知识得以有效生产、有序传授和高效转化，就需要相应的多样化高校组织形态加以承载。研究型高校要聚焦知识创造、科研创新，重在通过科学实验和学理探究深化原理性认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作出贡献；应用型高校要聚焦实践知识、应用研究，重在经验总结和现实观照中形成付诸行动的智慧，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从1到100”的应用转化和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作出贡献；技能型高校则要聚焦技艺知识、岗位技能，重在动手实操掌握生产一线知识技能，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从100到10000”的落地实施与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不同类型高



校不同使命，不同培养目标、研究方向与服务面向，各安其位、各擅胜场，形成分工有序、协同高效的高等教育体系。

从社会逻辑看，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挑战，面临着高校发展同质化与学科专业的适应性、人才供给的适配性等新旧交织的结构性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强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等五对关系。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首先是教育的政治属性要求。教育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需要能够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尖创新人才和原创性成果，也需要服务产业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既需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核心技术人才，也要满足不同层次生产力发展的人才需求；既需要理工科人才，也需要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以分类改革促特色发展，引导高校在各自领域不同赛道形成比较优势，才能更好适配和满足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支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契合教育的人民属性要求。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特征。高等教育需要以高适配性供给回应多样化需求。只有以分类发展牵引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各类高校立



足不同定位提供更加丰富多元、更高质量的教育选择机会，才能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多样成才的现实期待。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契合教育的战略属性要求。实施教育强国战略，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需要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战略支撑。所谓高质量，不是所有高校都向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看齐，千校一面，而是各类高校都能正确定位、坚于职守、发挥优势，在不同领域争创一流、各展其长，特色发展。良好的结构化程度本身就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正是提升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化水平与整体效能、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的应然之举。

二、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五个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在政策层面和学界渐成共识，各地高校积极探索，

成效经验可圈可点。但全面深化高校分类改革发展还面临体制机制性障碍，有待从根本上破局。分类改革政策信号虽已明确，但相关政策导向还待配套跟进，改革落实机制还不完善，相应的工具支撑还不够完备。必须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注重系统集成”，注重制度创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统筹推进教育系统内部各环节综合改革和外部关键机制协同联动。

第一，确立精准刚性的高校分类体系，防止功能模糊和赛道串轨。高校中既有“田赛”，又有“径赛”，既有“全能选手”，又有“单项冠军”。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当是一个纵向分层、横向分类的矩阵结构。没有精准分类，就没有科学评价，遑论科学发展。当前，一些高校定位不清、盲目发展，同质化严重，服务贡献不足，首要关键在于，职



能分工上不同赛道缺乏具有法规效力的权威标准,界定不清晰,类型内细分不完善;层次结构上,缺乏稳定又有约束力的区域高校布局长远规划,以及无序无休止“升格冲动”的约束机制。在缺乏刚性制度边界与游戏规则的情况下,高校持续追求升格转制,发生“学术漂移”,导致盲目办学、串轨发展就在所难免。升格冲动、评价导向、资源虹吸、利益机制、政绩观偏差等结构性拉力共同作用,形成微观奋进,宏观失调的不良竞争。1960年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之所以被公认为高校体系的典型案例,就在于其建立了层次分明、职能清晰、畅通衔接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通过法律手段明确界定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通过制度安排有效防止高校越轨办学。以长效机制解决了高等教育同质化和无序竞争问题,以及规模、质量、效率的难题,并平衡卓越

与公平的矛盾。故被全美各州借鉴,重塑了美国公立高等教育整体格局。可以说,加州乃至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分类体系的成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首先要确立具有法规效力的分类标准框架。按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多维度“差异化发展”的要求,形成高校分类“多维体系”。国家层面提供总体原则与框架,各省制定具体标准,并通过资质授权等制度安排,明确界定每一所高校的具体功能定位和办学边界。北京、上海做法可资借鉴。高校设置、升格改制,要明确界定学校性质类型、办学层次。同一轨道内部加强合作、形成联盟,不同轨道之间有“立交桥”设置,但不能随意越位、功能串轨。

第二,建立多元一体的高校评价体系,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评价是指挥棒。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评价以学科导向的学术评价为主导,标准单一,简单化、一刀切。不同类型高校容易在同一指标牵引下盲目向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看齐,即所谓“学术漂移”。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体多元评价体系。按照不同高校功能定位与服务面向,构建一体化差异化评价指标体系。一体化指系统性。对研究型高校,重点看在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打头阵、做尖兵,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能力与贡献,突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对应用型高校,重点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贡献,突出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突出应用研究及成果转化成效。对技能型高校,重点看促进产教融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能力与贡献,突出校企协同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成效。只有把评价重心从单一学科导向转向服务国家使命与实

际贡献上来,才能真正引导各类高校在各自赛道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第三,健全管用有效的高校激励体系,防止攀高趋同、名实不符的同质化不良竞争。激励机制是高校分类改革的重要牵引。长期以来,一些高校之所以存在“口头分类、行动趋同”现象,深层次原因在于激励机制的悖论。一方面是分类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是南辕北辙的激励机制,背后是争项目、争帽子、争院校升格、争学位点等强劲的动力杠杆。毋庸置疑,在特定历史时期,院校升格改制、竞增学位点,是事业发展的需要,这些“杠杆”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激励作用的确功不可没。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领域也是时候“去杠杆”了。要面向不同类型高校构建体现正确导向的差异化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



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特色优势和实际贡献，建立差异化拨款等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同时，推动激励制度“去杠杆”，完善高校设置，“降温”院校升格改制、改革学位点增设办法，把学校从一轮又一轮的申报与竞争焦虑中解放出来。一定意义上说，高校与学位点设置，布局比条件更重要。如全国50所师范大学可否直接授予教育博士专业学位（Ed.D.），改事前评审为事后审核，不合格取消资格，让学校把功夫下在提升质量而非申博上。“双一流”

“双优”“新双高”计划实施，旨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要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警惕激励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防止出现政策目标异化或执行偏差，演变为新一轮同质化竞争或“内卷”的刺激工具。真正把政策激励转化为推动高校安于本位、各

展所长的制度力量。

第四，强化精准有力的高校监管体系，防止方向偏移和分类失效。监管机制是高校分类改革落地见效的重要保障。现有教育督导监管对于高等教育弱于基础教育，更缺乏对高校分类办学精准有力的动态监测、具体监管与纠偏机制。许多高校容易受政绩观偏差、激励错位等因素影响，追求短期显绩，办学方向偏离自身定位，学科专业调整盲目跟风。而在现行央地事权格局下，地方政府的统筹监管权常有虚置甚至变异，在院校升格改制、学位布点、争取项目支持、评估检查等方面，常常与高校形成事实上的默契或“合谋”，与主管部门“博弈”。美国有的州也有类似情况，不像加州那样严格执法，难以有效抑制高校盲目升格。因此，必须加快构建覆盖高校设置准入、办学过程、监测预警、动态调整的全过程监管体系。常态化监测、



阶段性评估和第三方专业评价有机衔接,形成即时响应的监督合力。建立整改督查机制,整改结果与后续资源配置挂钩,真正让高校依定位办学。

第五,营造同向发力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匡正社会认知与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高校分类改革能否取得实效,既取决于教育系统内部的制度创新和积极作为,也有赖于全社会观念更新与教育外部环境的协同支持。我们传统文化中道本术末、君子不器、述而不作的观念、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深刻影响着社会认知与价值取向。社

会用人、升学就业选择、人才评价、项目评审、资源配置等方面“唯学历”“唯名校”“唯帽子”等倾向仍然无处不在,加之政绩观不正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削减着高校分类发展的内在动力。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离不开社会条件,不是教育部门一家努力所能成就。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在就业政策、人才使用、职业发展和舆论引导等方面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学历歧视和背景偏见,树立多样化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使全社会逐步形成这样的共识:分层、分类不是分等分级;高校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功能与服务面向不同;人才没有贵贱之别,只有岗位职责分工不同。只有当走特色发展道路的高校有地位、有荣誉、有回报,前景广阔,分类改革发展才能真正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制度生态和高校自觉。

**三、促进高校分类改革学会
要积极作为**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度重视高校分类改革研究。专家学者围绕高校分类标准、分类评价、分类管理等持续深耕，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为科学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完善政策设计提供学理支撑。根据教育部加强教育战略研究部署，学会将进一步配合相关部门，在学术研究、决策咨询、协作交流、监测评价方面充分发挥高端智库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强化学理支撑；积极建言资政，做好政策阐释；促进协同合作，推进成果交流；参与监测评价，提供专业服务，助推高校分类改革落地见效。

(来源：2026 年第 5 期《中国高教研究》)



高校分类评价的起点、挑战与路径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查道林

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环节。作为教育评价改革的核心内容，高校分类评价既是破除“五唯”、回归育人本质的系统性实践，也是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的重要保障。从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到 2025 年出台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逐渐明确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高校分类发展需要按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定位差异化设置指标。可见，高校分类评价已凝聚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政策取向与行动坐标。

基于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历史新方位，分类评价

正在成为破解当前高校“同质化”困境的重要指引。与以学术规模为导向的传统评价模式不同，分类评价强调依据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和发展目标进行差异化评估，体现了以质量为核心、以特色为驱动、以发展为导向的现代教育治理理念。因此，系统分析高校分类评价的现实挑战，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适切性，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 21 世纪初起，我国便逐步探索高校分类发展与评价的实践，从早期的“研究型、教学型、应用型”院校类型划分，到分类体系逐步细化并引入评价机制，经过 20 余年的探索积累，高校分类评价已从零散尝试逐步迈向规范化推进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与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这对高校传统评价模式带来



了新挑战，也对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高校评价体系构建提出了新难题。当前，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阶段，推进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学科特色与服务贡献的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是破解高校评价“指挥棒”单一化难题、办出特色追求卓越的重大举措。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拟围绕分类评价如何赋能高校多样化发展，剖析其价值旨归、梗阻困境与破解之道。

一、逻辑起点：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的目标导向

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其最核心的转变在于系统的多样性取代了单一性。当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传统的、单一化的评价模式已难以适应这一系统性变革。在此背景下，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成为引导高校科学定位、优化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的关键治理工具。为有效发挥教育评价对高等教育

的指挥棒作用，有必要先厘清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的目标，为明确评价内容、路径等提供清晰导向和根本遵循。

（一）体系结构之维：突破分层筛选评价体系，以分类评价引导高校科学定位

分类发展的首要前提是体系的多样性。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发展存在明显的“制度同构”倾向。而构建高校分类评价体系，是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破解同质化困局的核心切入点。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分类评价体系，是将这一宏观战略部署转化为实践行动的操作工具。一方面，分类评价是驱动高校分类改革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推



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通过构建科学的分类指标框架，为各类型高校设定差异化评价维度，既赋能高校主动校准战略方向、厚植差异化优势，又助推其以错位竞争获取优质资源，最终生成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另一方面，分类评价机制是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该机制秉持多元共治理念，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获得平等表达，驱动高教管理从“管理主义”向“治理主义”范式跃迁，进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的动态演化与多元发展。与此同时，差异化的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能够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匹配其功能定位的发展航标，引导高校摆脱大而全的同质化发展路径，转向特色化发展轨道。分类评价体系能够清晰传递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期待，将宏观分类发展政策转化为高校

可感知、可遵循、可落实的具体目标，激发高校立足自身实际、服务特定需求的内生动力，从而推动形成“各安其位、各展所长”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

(二) 功能实现之维：超越同质化发展路径，以分类评价激发高校自主创新内生动力

分类发展不仅在于“分”，更在于“类”的卓越。换言之，每一类高校都应在其所属的赛道上追求一流，形成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优势。理想的分类发展格局是：高水平大学以“以评促强、争创一流”为目标，勇攀科技高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而其他高校则重在“以评促建、服务发展”，将自身发展与区域经济和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分类评价的改革起点在于通过设计特色化指标、引入增值性评价，引导各类高校将资源与精力投入到最能体现其优势、最能催生创新成果的领域。比如，对于研究型大学，



评价应侧重原始创新与前沿突破；对于应用型高校，评价则需强调技术转化与产业适配。以激发内生动力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为高校的自主创新提供关键的制度支撑与战略牵引。

实施高校分类评价，是激活高校自主创新内生动能的重要支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新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心，要求完善科创体系框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载体，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既是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内在标识，也是构筑国际竞争优势的枢纽所在。分类评价通过为不同高校设定相匹配的创新赛道与目标，能够系统性地引导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营造勇于探索的创新环境，并科学评估创新效能，从而驱动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走好中国式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开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必须锚定改革主引擎、激活创新

驱动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高质量分类评价体系，助推高等教育提质增效。在此过程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尤其肩负着原始创新突破与科技攻关的引领使命。加快完善高校分类评价体系，既有助于在高校师生群体中树立改革创新导向、激活创造潜能，又能推动院校治理架构与科创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为持续开展原创性探索筑牢制度根基。这既赋能高校充分发挥科研禀赋与学科优势，也驱动突破性成果的高效转化与应用，为自主科研注入持续动能。承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时代使命，高校分类评价体系建设须锚定国家重大需求，彰显基础研究、原创突破与成果应用的导向，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水平科研供给，以评价机制牵引成果转化效能提升，进而夯实自主创新能力根基。

（三）价值引领之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以分类评价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分类发展的价值在于使高等教育体系对接国家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宏观战略需求，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高校分类评价以此为起点，要求其指标体系系统呼应国家战略导向与高校办学实践的协同。这就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呼应《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的“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等核心任务，转化为可观测、可比较、可引导的评价维度，从而驱动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能力的跃升。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

从本质维度审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包含双重意涵：其一是高等教育本身具备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教育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其二是通过学术赋能驱动强国进程，彰显高教服务国家战略的枢纽功能。高等教育的基础越稳固，教育强国建设的根基就越坚实、发展动能就越充沛。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离不开高校分类发展的有序推进，更需要科学的分类评价体系提供保障。具言之，高校分类评价体系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高校分类评价体系通过实时、动态、精准的数据监测，能够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循证决策支持，精准对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从根本上提升高等教育的治理效能与发展质量。二是通过设置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观测指标，评价体系能够有效牵引高校将发展重心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在急需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哲学社会



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领域主动作为，在不同赛道形成特色贡献。只有以高质量分类评价体系引领高校分类发展，才能充分释放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创新价值与支撑功能，推动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

二、现实挑战：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的实然困境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在高等教育进入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这一指挥棒的精准落地更显重要。作为关乎评价理念、指标体系与实施机制的综合性改革，推进高校分类评价须把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起点。虽然分类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共识，但政策落地中仍面临三重现实困境。

（一）分类依据不足：模糊的分类标准导致高校定位漂移

科学、公认的分类标准是分类评价的基石。实施分类评价的首要条件在于对高等院校进行科学合理的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完善的分类标准体系。尽管国内在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率先开展高校分类评价试点，但受单一的分类功能、模糊的权责结构的影响，在实践中，地方“双一流”建设高校存在办学定位趋于同质化，分类发展和特色发展动力不足等深层次短板。

首先，从教育理论研究上看，高等教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得这一工作面临较大困难。尽管已有诸多学者提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校分类方案，但就整体而言，迄今尚未有任何一种分类标准能够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与普遍接受。现有的分类框架难以有效引导高校结合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实际需求明确自身定位，难以助力各类院校彰显办学特色、达到应有的办学水平。



其次,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并进入普及化阶段。截至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然而,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也日益凸显。为追求发展水平的提升,大量高校,特别是许多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倾向于模仿传统综合性大学的模式,导致在办学理念、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缺乏自身特色和差异化定位。这种趋同化不仅模糊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边界,也使得高等教育体系难以精准回应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二)评价指标趋同:单一的量化指标削弱高校分类内生动力

特色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单一的评价指标会削弱高校分类发展的动力。分类评价本应

是高校特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现阶段高校的分类评价制度尚未健全,单一量化评价难以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当前,高校评价主要由社会开展的评价和政府主导的评价两类构成。一是社会开展的评价,主要由行业协会、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用人单位、社会公众等非政府主体发起,以市场化、多元化为导向,聚焦高校办学质量、人才培养成效、社会服务贡献等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的维度,评价标准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充分反映高校在市场和社会中的认可度与影响力。这类评价不具有强制性,却能为高校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倒逼高校关注社会需求、优化办学模式。如各类大学排行榜、用人单位对高校毕业生的满意度调查等,通过整合高校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生源质量、毕业生就业率等多方面指标,对高校进行综合排名,为考生报考、企业招聘、



社会公众了解高校提供了直观参考；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则聚焦毕业生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岗位适配度等核心维度，直接反映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为高校调整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是政府主导的评价，包含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审核评估、学科评估，以及地方政府针对本地区高校开展的办学水平评估、专项督导评价、经费使用绩效评价等，这类评价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导向性，是政府履行高等教育宏观管理职责、规范高校办学行为、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手段。这些评价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实施，结果直接关联经费拨付、项目申报、学位点设置、招生计划等资源，具有显著的行政强制力。国家依法对高等教育实施统筹管理与宏观引导，这是保障大学知识生产

现代化、推动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与方向引领，已成为塑造高校知识生产形态、支撑教育现代化推进的核心动力。作为一个典型的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行政力量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自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各项重大成就都体现国家主导的制度优势与战略推动。换言之，无论是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重点大学的建设，还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持续革新，国家权力的积极介入与顶层设计都在其中发挥了根本支撑与引领作用。较为典型的体现是“211工程”

“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这类政策是国家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增效、优化整体布局所实施的重点建设举措。但在实践推进过程中，部分评价环节逐渐形成重层次排位、



轻类型特色的导向，客观上加剧了高校办学同质化现象。

现有评价指标多聚焦于科研产出、学科排名等量化维度，而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的适配度、技术转化的实际效能等体现分类特色的指标关注不足。当论文数量、国家级项目、博士点等可量化指标成为核心评价依据，并直接决定财政拨款、招生指标、学科建设等资源的分配时，所有高校都会被卷入同一条“学术锦标赛”赛道。研究型大学被迫追求“大而全”的学科布局，应用型高校偏离了服务地方产业的办学初心，职业院校也陷入“升本焦虑”。这种评价指标上的单一性，从根本上压制了高校走特色发展道路的内生动力，使得分类发展难以真正落地见效。

（三）功能导向异化：偏离的分类发展弱化服务国家战略实效

当前高校分类评价体系在功

能层面存在异化现象，集中体现为“服务国家”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偏离了“分类发展”，这在“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评价导向中尤为凸显。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理应以服务国家为最高追求，其评价体系应有效牵引各类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为国家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应“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反映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多元多维成效评价体系”。然而，在具体实施的监测指标体系设计中，却未能充分落实这一分类服务国家的核心理念。比如，在“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监测框架内，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维度未能作为独立的一级指标得到凸显，仅在二级要素中设置了“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



这一项，且在三级观测点层面大多停留于写实性描述，缺乏可量化、可比较的贡献度评估。这种设计上的模糊与弱化，导致评价体系难以精准衡量不同类型高校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支撑区域产业创新、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实际效能。

与此同时，传统评价中根深蒂固的“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仍以各种隐性方式施加影响，呈现“重规模总量轻办学特色、重学术产出轻社会贡献、重横向排名轻纵向成长”的实践导向。这种片面、单一的价值标尺，导致无论是研究型、应用型还是技能型高校，都被迫或主动地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向能够快速提升传统量化排名的领域，从而挤压了本应聚焦的特色化发展、应用型科研、技术技能积累以及深度产教融合的空间。长此以往，评价的“指挥棒”非但没有引导高校各安其

位、各展所长，反而加剧了发展的同质化与功利化倾向，使得“服务国家”的宏大目标因缺乏分类落实的精细化路径而异化为新一轮的“指标竞赛”，最终会削弱高等教育体系整体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三、突破进路：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的优化路径

尽管当前高校分类评价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挑战与困难，但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趋势来看，只有持续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改革，引导各类院校合理定位、特色发展，才能更好地回应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的进程中，应从系统性政策强化评价制度建设等三方面发力，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一）理念体系重构：强化评价制度建设以激发高校多样化发展势能

高校分类改革的有序推进与



落地实施，已然成为当下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政策导向。放眼全球，借助分类评价等系统性政策举措推动高校实现多样化发展，以此破解高等教育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已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共识。

第一，要构建国家引领、地方支撑、高校落实的系统性分类评价体系。在国家引领方面，国家需发挥顶层设计核心作用，出台具有指导性、全局性的分类评价总体政策，明确高校分类的核心标准、评价导向与实施路径，划定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边界与核心任务，避免高校发展同质化、盲目攀比。同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方向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适时优化分类评价指标，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为地方和高校落实分类评价提供根本遵循。在地方支撑方面，各地要在遵循国家宏观政策整体框架的前提下，

充分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区域产业布局特点以及人才需求结构，系统构建能够覆盖各类高等学校的分类评价体系，有效引导区域内高校根据自身办学层次与定位实现合理分类、错位发展。比如，引导研究型大学聚焦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支持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需求强化技术转化，鼓励职业院校深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高校落实方面，各类高校应当依据中央及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导向，主动调整自身发展方式，结合各自的功能定位，积极探索差异化的成长路径，并据此制定与学校类型、办学特色相契合的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还需进一步增强第三方机构在引导高校多样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依托其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独特优势，为高校分类发展及特色办学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为充分发挥分类评价的导向效能、助力高校实现多样化发展，需进一步细化完善分类评价政策的实施细则。在政策细化过程中，要聚焦不同类型高校的核心职能，打破“一刀切”的评价困境，构建差异化、针对性强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研究型高校，重点突出基础研究成果、原始创新能力、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建设水平等核心指标，加大对重大科研项目、原创性成果的权重；针对应用型高校，强化产教融合深度、校企合作成效、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应用型人才就业质量等评价重点，推动高校与地方产业、企业精准对接；针对职业院校，聚焦技能竞赛成绩、毕业生职业技能等级、行业认可度、就业竞争力等关键内容，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同时，明确评价流程、实施周期、结果反馈与应用方式，将分类评价结果与高校资源配置、招生计划、职称评

定、评优评先、经费投入等直接挂钩，建立“评价-反馈-改进-提升”的闭环机制，确保政策细化到位、执行到位，真正引导各类高校立足自身定位，走特色发展之路。

第三，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的宣传与解读工作。这对于政策落地实施并有效引导高校走上多样化发展道路，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广泛传播高校分类评价的政策理念、目标要求与典型经验，积极营造理解、支持并积极参与分类评价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为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定位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如全面解读高校分类评价政策的核心意义、主要内容、实施路径和预期成效，让社会各界充分理解分类评价对打破高校同质化发展、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培育各类优质人才的重要作用。同时，积极宣传不同类型



高校特色发展的典型案例，展示研究型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应用型高校在产业赋能中的重要贡献、职业院校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突出成果，打破社会对高校“唯排名”的印象，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高校评价观、人才观和就业观。此外，搭建沟通交流平台，畅通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各类高校能在适合自身的赛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培育更多优质人才。

（二）评价工具创新：构建多元特色的工具体系以适配分类发展

科学的评价工具是理念落地、范式运转的技术支撑。分类发展理念能否切实引领高校实践，关键在于能否构建一套既能保障基础质量底线，又能精准识别与呈现多元特色的评价工具体系。当

前分类评价改革面临的核心工具性困境，在于指标体系的趋同化与单一化。无论是社会上的大学排行榜，还是政府主导的评价，其指标往往过度依赖易于量化的科研经费、论文数量等学术产出数据，导致应用型高校被指标“牵着鼻子走”，盲目模仿学术型发展模式，办学特色难以彰显。因此，必须创新评价工具体系，实现从“一把尺子量到底”到“多把尺子量不同”的转变。

构建能够表征多元特色的评价工具体系，首要原则是实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核心功能与使命，设置差异化的观测维度与权重。应当构建与不同类型高校相适应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并给予学校相应评价自主权。具言之，指标体系设计应遵循“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则。在设置基础性、共性指标保障基本质量的同时，必须针对不同类型高校的核心使命，设



计差异化的特色指标。比如,对于研究型大学,应侧重前沿科学突破、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影响力;对于应用型高校,则需重点考察产教融合深度、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对区域产业发展贡献率以及“双师型”教师比例等。可借鉴上海分类评价的经验,给予高校一定的指标自选权,允许其根据自身最突出的特色优势,自主选定部分定性或定量指标,并使自选定性指标权重达到一定比例(如30%以上),从而牵引高校专注优势、强化特色。

其次,创新评价工具要求采用适应分类评价的多元方法。单一的量化评分或终结性排名,无法捕捉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因此必须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一是强化过程性评价与质性评价,通过专家实地考察、师生深度访谈、教学档案查阅、典型案例等方式,深入了解高校的办学理念、育人文化、改革举措及其

真实成效,丰富数据来源。二是全面推行增值性评价,关注学校和学生在一定期限内的进步幅度。这要求利用大数据技术,追踪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在知识、能力、素养方面的成长轨迹,以及学校在特色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持续改进,从而识别高校的实际效能。三是探索以数据驱动的智能评价。传统的评价方式侧重于定性研究,缺少教育统计数据支撑下的实证依据。应充分利用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国家级和省级高校分类评价数据平台,整合“双一流”建设评价、教学审核评估、就业质量报告等多源数据,构建高校发展的动态数字画像。

最后,工具创新必须体现在评价标准的动态优化与专业支撑上,尤其要完善不同学科分类指标。针对自然科学类学科,评价重点要突出创新能力;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科,则应突出



其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专业性等核心特质。即使在同类型高校内部，对不同学科专业的评价也应体现差异性。评价工具体系应能灵敏反映高校在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服务国家急需和区域发展方面的特色化布局与实质性贡献，从而真正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克服指标单一化带来的束缚。

(三) 结果运用校准：完善发展赋能机制以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效能

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的最终成效，取决于评价结果如何被运用。因此，需要强化高校分类评价结果运用。一是引导教育资源配置。以分类评价结论为依据，对评奖评优、招生指标、经费投入、专业布局、科创平台等关键办学要素实施动态调整，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效能。二是将评价结论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以分类评价结果

作为衡量主要领导干部履职成效与治理能力的关键依据，同领导班子调整、职务晋升相衔接，构建权责明晰的激励约束机制。三是促进高校“以评促建”。加强分类评价结果的整理和分析，形成诊断性“体检报告”，引导高校注重自身发展的“进步空间”，推动高校根据评价结果进行自我诊断、自我改进。

另外，还要加强评价结果运用督导。一是在政府层面，要整合教育、组织、人才等部门力量，成立联合督导机构，督促办学主体对照评估反馈找准发展定位、补齐短板弱项。二是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高校评价并营造良性改革环境，包括规范政府评价、优化社会评价、强化高校自主评价。即评价结果的运用不应是政府的单方面决策，而应建立在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基础上。为此，不仅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结果发布与运用机制，吸收行业企业、



用人单位、第三方机构等多方意见，使资源配置和政策的调整更符合社会需求和高校发展的实际；而且要建设区域教育督导大数据平台，推动监测方法与技术升级，并构建“督导部门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评测机制，实现智能评价与动态预警，提升评价的科学性与公信力。

（来源：2026 年第 6 期《中国高教研究》）



高校办学定位知识统一性的表征与实践规制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刘振天

摘要：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的基本定位及其办学层次、服务面向、学科专业等具体定位，并非各自孤立、相互割裂的存在，而是以知识为基础形成的内在统一体，按照知识结构秩序展开并交互作用，在知识传承、生产、创新与应用的分工中担当不同角色、履行不同职责使命。当前，高校办学定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学术漂移”现象，深层根源在于知识结构认知的层级化、发展路径的传统依赖性、资源配置方式的身份导向以及评价体系的单一化。摆脱困境，须依循知识统一性法则，重构分类评价体系、确立目标与贡献导向的资源配置、重塑知识分工的组织文化、构建多元卓越的价值叙事，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校办学定位；知识结构秩序；知识统一性；学术漂移；多元卓越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按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这为高校分类发展和特色发展指明了方向。事实上，不同类型高校基本定位之间

及其内部定位要素之间不是孤立和割裂的，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统一，即围绕知识的生产、传承、分配、转化与应用展开的。高校办学定位的实质，是其在知识结构体系中的角色确认及其采取的相应行动。

一、知识结构秩序作为高校办学定位统一性的基础逻辑

高等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始终以知识为载体，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差异，本质上是高校活动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分工之别。布鲁贝克提出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理念，看似对立实则以知识为共同根基：认识论以探究和增进知识本身为目的，政治论侧重以知识为手段服务社会。由此，知识便成为统合高校目标与职能的基础逻辑，而知识结构秩序则是诠释高校办学定位统一



性的内在依据。

(一) 知识结构秩序的一般形态及其功能

所谓知识结构秩序,是人类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按照知识的性质、功能、程度和呈现方式等维度形成的层次分明、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这一秩序不是人为强加的外在分类,而是知识内在逻辑与社会实践需求相互作用的历史性产物。具体而言,按照对象领域,知识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以及交叉综合科学知识,其下又细分为不同层级的学科与方向;按照功能与目的,可分为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按照呈现方式,可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按照教育目标,可分为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等。

知识结构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序列化。人类总体认识经历

了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或阶段,但知识作为认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恰好与认识过程相反。这也是知识作为思维中的具体的规定性。作为认识结果或思维中的具体的知识体系,一般按抽象的基础理论知识、中间的应用技术知识和具体实践操作知识这一路线构成清晰的结构链条,每种知识形态均有独特的生产方式、传播路径与价值体现,其相互作用,形成连续的统一体。二是动态化。不同知识在结构秩序间双向或多向流动、支撑和转化,基础理论知识支撑并可转化为应用技术知识,具体场景化的实践操作知识又反向支撑和推动应用技术知识及基础理论知识的创新。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知识的这种正反作用和交叉作用现象越来越普遍,以至于不同的知识边界日益开放。三是分工化。结构秩序中的不同知识形态对应不同使命与目标,服务不同对象



与需求。

高校是知识保存、传承、转化和创新的场所，通过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等职责。然而，高校及其内部院系或专业之间，知识的分布或分配并非杂乱无序，而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专业结构及能级结构，实质上是知识在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以及院系间的分布或分配方式。同样，知识分布或分配形式影响和制约高校办学定位，并由此形成高校间知识分工与协作关系。

（二）知识结构秩序中高校办学定位统一性的表征

高校办学定位是一个包含基本定位、层次定位、人才培养定位、服务面向定位、学科类型定位、特色定位等多要素的集合体。要素之间存在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有序结构，这便是高校办学定位

的知识统一性。具体言之，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知识性质规约着高校的基本类型定位，知识深度框定了高校办学层次和培养目标定位，知识广度制约高校服务面向定位和学科专业定位，办学特色定位则是高校在特定知识区段形成的独特知识禀赋与比较优势。其中，基本定位是核心，其他定位或是基本定位的派生，或是不同表现形式。

1. 基本类型定位。《纲要》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目标要求，明确了不同高校的知识性质与基本使命。研究型高校总体上处于知识结构秩序中的抽象理论知识一端，任务在于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开展基础性和原创性研究，致力于知识发现与创造，拓展基础科学边界；应用型高校处于知识结构秩序的中间带，具有综合性与过渡性特征，以整合基础理论知识与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方案的研发与转化为目标，



致力于知识的融合与应用，培养工程和社会实践型人才；技能型高校处于知识结构秩序中的操作知识一端，以传承场景化实操知识、推动技术技能的创新与产生实际效益为己任，致力于知识的具象化与职业化，培养工匠型人才。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种类型高校办学定位，在知识结构秩序中构成从侧重基础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到应用原理知识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开发，再到技术方案和场景化实操知识的人才培养与技能革新的连续序列。不同高校办学定位既分工明确又相互衔接，承担着不同的目标、职能与任务。

2. 办学层次定位。高等教育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等多种层级。有的高校是单一层次的，有的高校是多层次的。层次定位关系高校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复杂程度。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高深基础性、

前沿性和交叉性的学术活动，以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为主体，注重教学内容的学理性、系统性、前沿性以及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侧重于向学生传授应用性知识，强化实践知识与技术技能培养，以开展专科和职业本科教育为主，适当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注重技术研发与创新。

3. 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定位指向于将知识结构秩序中特定性质与程度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和素质结构。研究型高校培养目标为厚基础、宽口径、重交叉、强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强调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与前沿性，强化原始创新、理论突破与跨学科研究能力；应用型高校培养目标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工程和社会实践型人才，强调知识结构的综合性和应用性，强化应用原理知识与技术知识的



整合以及向实践转化的能力；技能型高校培养技术技能型和操作型人才，强化场景化实操知识的掌握与解决现场问题的能力。三种类型高校培养的人才，不是各自封闭和割裂的，不论哪种人才，都要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4. 服务面向定位。高校服务面向是由知识结构秩序中知识性质、广度和深度决定的。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服务面向最广，以国家战略需要为己任，其培养的人才与提供的知识适应面宽；应用型高校次之，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主；技能型高校服务面向更具体，直接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高校服务面向与知识性质、广度及深度之间呈正相关，即服务范围越宽，则知识面越广，越具抽象性、学理性、高深性、交叉性和前沿性；服务范围越窄，知识就越呈具体性、场景性和操作性。

5. 学科专业定位。学科专业定位主要分为综合性、多科性和单科性三种，其在知识结构秩序中描述的是知识活动的范围、所属领域的广度以及知识生产的方式。综合类高校，学科专业齐全，分布广泛，知识活动具有宽厚性、综合化与交叉性；多科性高校侧重某一类或几类学科专业，强化与其他学科专业协同发展；单科类高校突出某一学科或专业特定的知识与技术，注重学科专业知识的峰度或一线应用性。

6. 办学特色定位。办学特色反映的是高校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独特禀赋，是高校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属于自身知识活动传统、活动领域或活动方式。高校的基本办学定位、层次定位、学科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定位、服务面向定位等都影响办学特色，是办学特色生成的基础。这是因为办学特色不能脱离上述各具体定位独立存在，它总是要通过其



他定位和活动反映出来。办学特色的实质，是高校在知识结构秩序中形成的不可替代的分工优势。

(三) 知识结构秩序下高校办学定位的协同性机制

高校办学定位的知识统一性，不仅体现为高校内部定位要素的逻辑统一，更体现为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知识协同与共生。知识结构秩序的连续性决定了不同办学定位的高校知识活动的统一性、有序性和相互依赖性。一方面，研究型高校的理论知识研究与人才培养，为应用型高校的技术知识研发和实践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源头支撑，应用型高校的技术知识研发又为技能型高校的场景化知识应用提供基础，由此形成知识从理论到实践的正向流动。另一方面，技能型高校在实践中产生的场景化知识问题，反向推动应用型高校的技术知识方案优化；应用型高校的技术知识研发需求，又反向引导研究型高校的基础理

论知识研究选题，从而形成知识从实践到理论的逆向反馈。这种知识的双向互动，使得不同类型高校之间形成相互依存、交互赋能、共同生长、协同发展的生态链。

二、知识结构秩序下高校办学定位失当

知识结构秩序下的高校办学定位，既是基于知识统一性的理想类型描述，也是高校知识活动的经验总结。然而，现实中的高校办学定位，受知识价值观、制度设计、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了偏离知识结构秩序的倾向。集中表现在高校基本办学定位与知识性质、范围和程度等背反，由此带来高校分类发展难题。一是应用型与技能型高校存在明显的上行式学术漂移现象，朝知识结构秩序的基础性、学理性和抽象性方向攀升逼近；二是研究型大学存在明显的下行式和外延式漂移现象，其目标、功能



与范围过度扩张，短期功利化办学倾向明显。其实质是不同高校知识结构秩序失调与错位。

(一) 高校办学定位失当的两类表现

高校办学定位失当，主要有两类表现。一是应用型与技能型高校的上行式学术漂移，二是研究型高校下行式和外延式学术漂移。

1. 应用型与技能型高校的上行式学术漂移。学术漂移不单指该类高校追求升格、更名或争取重点项目等提高办学层次与地位现象，还指其偏离自身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性质与功能定位，忽视或舍弃本原性办学目标与基本使命，进而将上一层次高校的知识活动模式作为自身的办学目标问题。从知识结构秩序视角看，上行式学术漂移的本质是知识活动的虚高化和脱域化。

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以“改名大学、申硕、申博”为目

标，将大量资源投入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科研项目申报，却弱化了产教融合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薄弱，学生实习走过场。这种“上不学、下无术”的尴尬处境，正是上行式学术漂移的典型写照。有的高职院校以“升本”为动力，效仿上一层级教育模式办学。上行式学术漂移导致高职院校“既不高、也不职”，降低教育质量。当然，上行式学术漂移也并非一无是处，不同高校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存在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弹性。区域经济社会以及高校自身条件发展变化，会带来办学目标定位的改变，这有利于激发高校办学活力、提高学术水平、增强持续发展能力。这也是政府每年都审批少量高校升格和更名的缘由。

2. 研究型高校的下行式和外延式学术漂移。研究型高校在办学过程中，职能过度向外扩张，



从事过多的非学术性活动；或者过于向下延伸，从事本该由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承担的教育教学和服务职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世纪末，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当时，受到高等教育发展和办学经费不足的双重压力，一批国家重点大学利用自身独特地位和优势通过职能拓展向市场要资源。一些重点大学直接面向企业开展培训、解决技术难题，或者直接创办校办工厂、企业和公司，举办各类学历和非学历层次的成人教育或高收费性质的独立二级学院，推行产业化和市场化。此外，重点大学还广泛开展一定规模数量的高职高专教育，培养专科学生或接收专升本学生。只是到了 21 世纪初，随着国家政策调整 and 高校分工体系不断完善，重点大学（主要是原“211 工程”和原“985 工程”建设高校）才逐渐降低市场化办学程度，直到完全退出专科教育层次，集中时

间、精力和资源用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

重点大学下行式和外延式的学术漂移，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诸如，借助和发挥重点大学学科专业齐全、人才济济、学术水平高等优势，提高社会服务质量，支持和带动地方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事业发展。但弊端也不容忽视，它偏离了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模糊了自身的知识价值与宗旨使命，高水平基础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一度被稀释，削弱了研究型大学应有的学术引领地位，挤压了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发展空间与机会。同时，过度下行式和外延式发展，影响到重点大学质量和声誉，造成高校办学同质化和无特色。

（二）高校办学定位失当的深层原因

高校办学定位失当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知识价值认知、办学



模式、制度设计与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叠加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1. 知识地位等级化认知与大学合法性迷思。从古希腊的知识分类到中国传统的“道器之辨”，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知识价值和作用的等级性认知。亚里士多德最早将知识分为理性知识、实践知识与创制知识三种类型，认为只有理性知识才是纯粹的和真正的知识，而职业知识和制造知识是不自由的和低级的知识。同样，中国古人也崇“道”抑“器”，将生产劳作技能视为雕虫小技和奇技淫巧，不能登堂入室。这种认知传统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延续，以至于“只有研究型大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校”成为社会“共识”。而应用型、技能型高校要获得社会认知的合法性，必须走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否则便被视为低层次低质量，甚至被排除在大学门外。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

为了提高自身地位和获得社会认可，千方百计地向研究型大学看齐，以攀高求全作为目标和价值追求；研究型大学则利用自身合法性地位及先天优势，向下或向外不断扩充职能，达到获取更多资源的目的。

2. 传统模式路径依赖与高校转型时艰。现代之前的大学有如象牙塔，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责，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套以学校、课堂、书本和教师为中心的学术化制度体系与运行模式，注重学科自身逻辑，较少考虑外部生活和工作世界变化发展需要。几百年来，大学一代代沿袭和传承下来，形成了固定化的套路和路径依赖，几乎所有的高校办学都自明性地以此为模板和样式，不可避免地带来单一化和同质化。按照新制度学派的趋同理论，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会倾向于模仿已被验证为“成功”的模式，即按照“低成本和易操作”



的成熟体系，这样可以显著降低风险和提高效益。这也是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不愿意另辟蹊径的先天遗传性原因。然而，真正办好应用型和技能型教育，必然和必须破除传统的知识型和学术型教育模式，要走出校园、走出课堂、走出书本等舒适区，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广泛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变化现状、趋势和要求，切实深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校地合作，强化实践教学，注重经验性、场景性、操作性等隐性知识的习得，教会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本领。所有这些，对于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尤其是管理者和教师而言，是以往不曾经历的陌生领域，缺乏相应的知识、能力与心理准备，难免遇到各方面的困难和阻力，使其不敢、不愿或不能迈出关键一步。

地方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转型难是不争的事实，“双一流”

建设高校等研究型大学同样存在转型难问题。依照知识结构秩序要求，研究型大学主要任务是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要，专注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和教育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世界教育和知识中心。为此，高校须回归本位，深度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3. 身份导向下的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僵化。长期以来，出于资源总体有限以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教育差距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实行非均衡发展策略，资源优先保证重点大学或“双一流”建设高校发展需要，而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则面临办学资源匮乏困境，影响教育质量和声誉。这种配置是典型的“政治资源”模式，即资源投入并不完全由高校办学业绩与增值状况决定，更多取决于高校的等级、身份与地位。从事基础性前沿性知识活动的研究型大学资源丰盈，从事知



识研发与技术转化的应用型高校资源次之，从事技能操作和实践性知识活动的技能型高校资源最少，由此现实地形成了高校不同等级，迫使应用型和技能型高校办学向综合性和研究型大学看齐，在狭窄的金字塔单赛道上竞争资源。

4. 面子文化下高校发展的“指标性攀比”。中国的面子文化传统在高等教育领域有着突出表现，集中反映在有如“别人家的孩子”的现象。无论是政府之间，还是高校之间或学科专业之间，都存在着指标攀比或指标竞争问题。在纵向上，办学过程中不断提高事业发展目标和标准，在横向上总是参照别的同类高校。这种攀比和竞争，虽然有利于促进自身发展，但更多的是为了脸面，过分看重外在的身份标识和地位，忽视自身的基础条件与外部需求。同样，地方政府也受面子文化影响，将升格、更名或排

序晋级视为重视教育的表现和政绩；社会评价和选择高等教育，也看高校的出身和排名。这一切加剧了高校间同质化竞争，影响了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生态。

三、知识结构秩序下高校办学多元卓越

摆脱高校办学定位失当，走出学术漂移困境，需要遵循知识统一性法则，以知识结构秩序为基础逻辑，重构基于知识结构分工的高等教育发展体系，推动各类高校形成不可替代的知识禀赋优势，实现多元卓越。需要说明的是，矫正办学定位失当并非要求高校固守某一固定位置、排斥任何形式的知识跨界。在坚守核心知识使命的前提下，不同类型高校之间适度的知识流动、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恰恰是知识生态健康发展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跨界应当服务于核心使命的深化，绝非偏离或放弃



自身的知识根基。

(一) 变单一量化评价为知识贡献本位评价

评价是高校办学的指挥棒，重建评价体系是矫正高校定位失当的突破口。需要摒弃一把尺子量所有高校的单一化评价模式，立足知识结构秩序，建立以知识贡献为本位的分类、分层等多元评价体系，使不同类型高校在各自的知识分工体系中都有明确的评价标准，确立属于自身的知识价值。

1. 建立基于知识结构秩序的分类评价框架。根据《纲要》的高校基本分类，设计差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应与高校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各种知识活动相一致。例如，对于研究型大学，重点评价其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与长远社会价值，降低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短期量化指标的权重，强化对重大基础科学问题解决、原创理论提出、颠覆性技

术孕育以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的评价比重，引入学术代表作制度与长周期评价机制，鼓励十年磨一剑的潜心研究。对于应用型高校，重点评价其知识转化效能与区域服务贡献，包括技术成果转化率、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数量、专利产业化的应用效益、订单式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本地就业率、对区域产业升级贡献等。为此，应建立由行业企业、地方政府、用人部门深度参与的评价机制，将用户满意度作为关键依据。而对于技能型高校，评价的重点则是技术技能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就业，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指标包含专业与产业总体适应度、学生职业技能证书获取率、学生岗位适应能力、生产性实训基地使用效率、校企合作深度等，突出评价高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行业紧缺人才供给情况。

2. 推行诊断性评估替代等级性评比。破除长久以来习以为常



的以等级评价与标签式排名评价模式，转向诊断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评价的目的不在于给出分数或排出位次，而是精准分析高校在知识结构秩序定位上的优势、不足与改进方向，为高校的特色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将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对坚持自身知识分工定位、作出突出知识贡献的高校，给予专项奖励与资源支持；对出现明显定位失当的高校，及时发出预警并调减相关资源，通过评价引导高校回归理性定位。

3. 培育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减少直接由行政部门组织的评价，减少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评价过程，着力培育一批公信力好、专业化程度高的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推动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基于公开、透明的分类评价标准，开展专业性的评价活动，打破单一评价体系的垄断。同时要鼓励行业

协会、龙头企业参与高校评价，形成政府、社会、行业、高校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为社会提供更立体、更全面的高校办学质量信息，削弱高校对单一化行政排名的过度依赖。

(二) 从身份导向到使命引领的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是高校办学的物质基础。矫正高校办学定位失当，必须打破身份决定资源的导向，将资源配置的逻辑从依据身份和历史地位转向依据知识使命和实际贡献，立足知识结构秩序，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精准的资源赋能，让安于其位、精于其业的高校获得必需的资源支持。

1. 建立与分类评价联动的财政拨款体系。将公共财政拨款分为基本保障性拨款与绩效引导性拨款两部分。基本保障性拨款保障高校的日常运转，体现教育公平，确保应用型、技能型高校拥有基本的办学资源；绩效引导性



拨款则与分类评价结果相关联,适当提高其在财政拨款中的比重。绩效拨款的分配,严格依据高校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知识贡献。通过绩效拨款的有力引导,让高校的发展重心回到自身的知识使命,从而真正解决学术漂移问题。

2. 设计平行等值的专项发展通道。中央及省地两级管理部门应设立一系列平行、等值且导向有别的重点建设计划,为不同类型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平台。改变以往资源过度向研究型大学倾斜的政策,进一步优化“双一流”建设。按照《纲要》精神,尽快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扩充,防止“双一流”身份固化,实行有进有出的灵活调整政策。努力提高职业教育“双高计划”支持力度,提升其影响力,为建设一流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创新型工匠人才创造强有力的条件和环境;对于地方应用型高校,尽快出台和落实“双优”计划。考虑到应

用型高校量大面广,又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建议选择200~300所高校作为重点支持对象,达到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真正让不同定位高校在各自赛道和优势领域特色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3. 改革项目与人才评审制度。打破科研项目与人才评审的“学术金本位”,立足知识结构秩序的不同区位,设计差异化的评审标准与通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评审中,单列面向应用研究、技术转化与技能创新的项目类别,评审专家库吸纳相当比例的产业界、行业界代表,评审标准突出需求导向与实践价值。在人才计划评选中,分类设置学术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荣誉称号,设立产业教授、技术大师、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专门面向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支持计划,使其社会地位、待遇与研究型人才并行,



让不同类型的知识人才都能获得认可、尊重与发展。

(三) 营造从趋同竞争到知识分工的组织文化生态

制度与资源对于高校发展而言,是外部刚性约束;而组织文化则是柔性的内部基因,其对高校发展影响更加深沉长远、细致入微。矫正高校办学定位失当,归根到底,需要高校形成与自身知识使命相适应的文化自觉。

1. 强化战略规划的知识逻辑。

高校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首先明确自身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性质与目标,将知识分工定位作为战略规划的前提。规划的论证与制定,需详细阐释办学层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服务面向等定位要素是如何围绕核心知识形成内在一致逻辑链条。规划文本要让高校师生员工全面知情并认同,要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质询与监督,并将其作为主管部门审计、巡视高校重大事项的基

本依据。通过制度化的战略管理,促使高校理性思考,避免盲目攀比与定位漂移。

2. 培育以知识使命为核心的内生动力。高校领导者应成为自身知识使命的践行者与维护者,在校内开展广泛的教育思想讨论,让全体教职员工理解并认同学校在知识结构秩序中的分工定位与独特价值。研究型大学弘扬科学探索精神,宽容失败、抵制功利,引导教师主动面向国家战略需要潜心于基础研究、原创创新和重大科技突破。应用型高校塑造扎根地方和服务产业的共同体文化,推崇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成就感,推动校地、校企深度融合。技能型高校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工匠精神,让师生以精湛的技术技能为荣,强化技术技能的传承与创新。通过文化建设,将外在的政策要求内化为高校组织成员的价值追求。

3. 构建开放协同的知识创新



生态。打破高校之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推动知识在结构秩序中的自由流动与转化，构建“研究、应用、技能”一体化的知识创新生态。研究型大学积极与行业龙头企业、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让基础研究的选题源于实践需求，让研究成果的转化通道更加顺畅。深化校内学科交叉融合，打破院系壁垒，围绕重大科学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避免知识生产的封闭化。应用型与技能型高校应主动与研究型大学共享基础理论知识与科研成果，为自身的知识转化与技能创新提供理论支撑。更要向产业深处扎根，与企业共建共管现代产业学院、大师工作室，推行校企双元育人，让知识活动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政府应搭建区域性的“产学研用金(金融)”一体化平台，为知识的流动与转化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各类高校在知识生态链中相互赋能、

协同发展。

(四) 构建从层级攀升到多元卓越的价值叙事

社会的价值叙事是高校办学定位的深层文化土壤，矫正高校办学定位失当，必须打破“层次即水平、学术即高等”的单一成功叙事，构建尊重知识分工、崇尚多元卓越的价值共识。

1. 塑造多元卓越的公众认知。

政府与主流媒体应协同发力，加大对各类高校卓越典范的宣传力度，淡化对研究型大学的单一推崇。不仅宣传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也要宣传应用型高校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中的关键作用，更应宣传技能型高校在培养大国工匠、支撑中国制造中的卓越贡献。通过国家教学成果奖、科技进步奖、技能大奖等荣誉的授予，鲜明地向社会传递“应用型、技能型高校与研究型大学本无高低之分，仅为分工之别”的信息，



确立“各行各业都能出彩、各种类型皆是卓越”的信念。

2. 建立知识贡献导向的社会声望体系。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与对应类型的高校深度合作，联合设立奖学金、冠名实验室、发布行业人才需求与高校贡献排行榜，让高校的社会声望源于其实际的人才和知识贡献。让社会认识到，技能型高校培养高水平毕业生，应用型高校为区域社会及产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与研究型大学理论成果都应受到尊重，都应成为办学成功的标志。要优化高考招生宣传，引导考生和家长根据自身的志趣、特长与职业规划，选择最适合的知识轨道与高校类型。

3. 重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知识观与教育价值观，在全社会树立普及化阶段科学的人才观与质量观，坚决破除“唯学历、唯名校、唯学术”的认知误区。通过政策引导、舆论宣传、典型示范

等方式，大力弘扬实践育人、技能成才、人人皆可出彩的价值理念。唯有真正承认知识类型差异与分工价值，摒弃知识层级化、教育等级化偏见，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学术漂移与同质化办学的文化土壤，为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筑牢社会根基。

(来源：2026 年第 5 期《中国高教研究》)



应用型大学需三大系统性“重塑”

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长 贾文胜

2015 年，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首次为应用型大学建设出台专门政策，目的是推动地方高校换赛道、转类型。历经十年探索，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与特色日益清晰。

2026 年，教育部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推动应用型大学高水平发展、争创一流。这标志着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已完成“转型发展”的数量积累，正式迈入“提质创优”的质量飞跃新阶段。

“双优”工程的提出，是回应产业变革、遵循高教规律、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产物，可谓正逢其时、势在必行。

首先，这是服务国家经济转

型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迫切需求。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时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生产方式与就业结构，产业界亟需一大批既掌握扎实理论基础，又具备精湛技术应用能力、强大工程实践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大学正是这类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双优”工程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和资源聚焦，遴选并建设一批标杆院校，引领应用型大学整体提质，构建起与产业结构高度匹配的类型化高等教育体系，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其次，这是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破解“中部塌陷”困境的内在要求。过去 10 年，应用型大学转型让许多地方高校找到了



自身定位,摆脱了“千校一面”的困境。但多数应用型大学仍面临“中部塌陷”的尴尬:与研究型大学相比,缺乏高深的学术积淀和原始创新能力;与职业院校相比,技能训练的精度和深度又显不足。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使其在传统评价体系中备受挤压。“双优”工程为应用型大学量身打造了全新的评价体系与发展赛道,使其彻底摆脱追赶研究型大学的路径依赖。

至此,应用型大学“双优”工程与研究型大学“双一流”、职业院校“新双高”并行,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引导各类型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在各自赛道上深耕特色、高质量发展。

办学能力优质是“根”,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果”。二者如一体之两翼,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统一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全过程。

办学能力优质是强校之基,核心在于内涵做实。它要求大学

回归教育本源,将“应用型”这一类型特质,系统性、全链条地融入人才培养、师资建设、课程体系、科研组织、质量保障等办学治校的每一个环节。其目标是练好服务区域发展的“内功”,将应用型大学的“筋骨”锤炼得更强壮,特色擦拭得更闪亮。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兴校之道,核心在于价值做显。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不能只看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申请了多少项专利,更要看区域对它的认可度和依赖度,看它是否能做到“人丁兴旺、门庭若市”。这要求大学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城市和区域的宏大叙事中,不断提升大学的城市贡献力和产业服务力,最终实现学校发展融入区域发展、学科专业发展融入产业发展、学生发展融入职业发展,将学校办成城市共生型大学、产业伙伴型大学。

当然,“双优”工程不可能通过对传统办学模式的修修补补来实现,必须厘清以下“三大”



系统性重塑，方能突围。

一是重塑大学内部治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内部运行逻辑必须彻底变革。首先，在组织架构上，应打破传统“学院-学系”的学科壁垒，围绕区域产业链，重组设立产业学院等新型组织。其次，在评价激励上，必须改革以论文为核心的传统评价体系，构建一套突出“实践贡献”与“产业服务”的“双师型”教师分类评价新标准，提升横向课题、技术转化、社会服务等指标的权重。最后，在资源配置上，要摒弃“撒胡椒面”的分配方式，建立以服务区域贡献度和产教融合成效为核心的绩效投入模型。

二是重塑大学与产业的关系。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与产业的关系必须超越实习、讲座等浅层互动，走向“产教融合”的深度一体化模式。其关键在于联手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基地等实体化合作载体。在这些平台上，企业的真实项目即学生的学习课

题，企业的技术难题则直接转化为教师的科研方向，从而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捆绑机制。

三是重塑大学与城市的关系。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从游离于城市之外的“象牙塔”转变为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心脏”和“大脑”。这需要拆除物理与思想的“围墙”：一方面，将大学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资源向社会有序开放，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将城市产业园、创新街区等作为大学的“无界课堂”和“开放实验室”。

大学的战略规划也必须与城市发展蓝图同频共振，主动承担起城市产业升级“智库”、市民终身学习“枢纽”和文化创新“引擎”的角色，最终实现校因城兴、城因校盛的共生发展格局。

(来源:2026 年 5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



应用型大学应破除四大“惯习”

安徽艺术学院院长 柳友荣

今年3月7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介绍，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即“双优”工程。“双优”工程连同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高职院校的“新双高”建设，构筑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发展体系，从而引导高校各就其位、各美其美。

“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作为“双优”工程的外在表征，是应用型大学的“一体两面”。“办学能力优质”是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本体目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大学的外在品质。办学能力是大学生存的基础、发展的保障。服务区域则是大学意义所在、价值追求，二者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辩证统一。

“办学能力优质”要求应用型大学在办学实践中，深度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学科专业对区域产业的适应性、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区域资源的整合能力等方面显示“优质”的同时，在大学办学的“外向度”上，也需要显示出足够的区域开放性。所谓“外向度”，是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功能主动融入区域发展的程度。“外向度”表现在大学组织和制度拟定的“外向化”，建立“区域数据研究与服务中心”“区域发展协调办公室”等机构作为协调大学与政府、行业的“旋转门”，把带着知识、成果“走出去”，与带着问题、需求“返回来”统一起来，激活大学发展持续展现活力。

“服务区域优秀”要求应用



型大学在区域经济社会互动过程中,保持积极而开放的心态,依据区域特点,选择办学行为,在大学对区域社会的“贡献度”“融合度”两个“度”方面下功夫。大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是服务的“果”,而大学与区域社会的“融合度”则是服务的样态,是服务的过程,是“因”。换一句话说,考察一所应用型大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是了解大学究竟对区域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效用;考察大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则是看两个主体互动的频次和嵌入的深度。

当然,应用型大学“双优”工程要去“优”什么?正确把握“双优”工程内涵是前提。

首先,理解“办学能力优质”,必须从“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出发,成为区域“高引领力”大学,一所“有力”的大学。也就是说,“办学能力优质”不是要

与研究型大学、技能型大学比较“研究型”“技能型”办学能力,盲目模仿研究型大学、技能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模式,从而陷入同质化发展困境。应用型大学创新办学模式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合理分工的重要表征,如何让自己“接地气”,解决区域社会的实质需求。

其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需要应用型大学成为区域“高支撑力”大学,一所“有用”的大学。区域大学的生命力取决于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没有用,能不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当学校所在区域产生需要大学解决的研究型问题、项目等时,教授们应该义不容辞,将自己的研究旨趣转向区域需要,倾听产业声音,从理论研究转向回应区域所求,呼应产业声音,为社区提供了知识服务,解决了生产难题。

笔者认为,应用型大学在创



建“双优”的过程中，需要破除几个“惯习”。

首先，是从“千校一面”到发达沿海地区访企拓岗，忽视人才供给“在地化”。为了破解毕业生就业的压力，不少学校领导放弃研究如何为区域培养“在地”人才，而是“远征”长三角、珠三角等，这种人才培养的盲目性、同质化势必折损应用型大学的生命力。

其次，是区域内科研服务。一段时间以来，定位于“地方性、应用型”的一些大学乐此不疲地在论文、奖项的“学术 GDP”上谋篇布局，却忽略了这些论文、奖项与区域社会的关系有多大。

再次，是专利转化。不少大学都习惯于比较库存“发明专利”，可这些专利是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研发？发明专利本地转换率是考核一所应用型大学的实实在在的显性指标。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5 年中国专利调查

报告》显示，2025 年企业的发明专利转化率 54.0%，科研单位为 17.2%，高校仅为 10.1%。应用型大学可否采用“产权直通车”形式将授权专利免费让渡给企业，并借此与企业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

最后，总是把“外聘教师”视为该严格控制的现象。各高校也为了应对评估要求，对“外聘教师”羞于启齿。殊不知，“外聘教师”来自行业企业，对最新岗位要求、技术进步了然于胸，有全职教师难以比拟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应用型大学发展经验是，有很大一部分教师来源于生产一线。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外聘教师”的归属感，实行外聘教师登记卡制度、指派“兼职助理”以及实施“情感支持计划”等措施有助于改善外聘教师处境，增强与区域社会的协调与联系。

(来源:2026 年 5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

南京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孙爱武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创新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其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大批能够创造新技术、催化成果转化、开拓新产业的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而应用型大学正是培养这类人才的主力军。江苏肩负着在国家科技创新格局中勇担第一方阵的使命，拥有雄厚的高教资源与完善的体系，扎实推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引导省属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深度转型，正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激活经济创新动能的关键之举。

深刻认识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的 战略必然性

推动应用型高校转型建设，绝非简单的办学层次调整，而是顺应时代变革、服务国家战略、遵循教育规律的战略抉择。

响应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兼备扎实理论、卓越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能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高校侧重培养学术精英、职业院校侧重培育技能工匠不同，应用型高校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锻造卓越工程师、技术骨干与一线创新者的摇篮。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为“德国制造”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的成功实践表明，高水平应用型高等教育是支撑产业升级与经济竞争力的基石。

赋能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江苏实体经济根基深厚，产业体系完善，正从“制造大省”加快迈向“智造强省”。然而调研显示，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江苏的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



缺口巨大。应用型高校扎根地方、贴近产业，其学科专业与区域经济脉动同频共振，在定向培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在地化技术骨干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同时，应用型高校聚焦应用研究与关键技术开发，能更敏捷响应企业技术需求，推动科技成果“在地转化”，直接服务区域产业创新与能级提升。

遵循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办学，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教育服务贡献度的必然要求。江苏高等教育已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迫切需要打破同质化发展窠臼，构建功能互补、梯次衔接、良性互动的高等教育生态。对于多数省属高校而言，遵循“学术逻辑”与研究型大学去比拼论文、课题并非优势所在，也难以有效服务地方；而强化“应用逻辑”，立足地方、依托地方、服务地方，在特定应用领域形成不可替代的

特色优势，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

准确把握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的理论遵循

应用型高校转型非一日之功，必须深刻把握其背后的理论演进逻辑，确保转型方向不偏、路径科学。

知识生产模式正经历从学科导向到应用导向的深刻变革。传统知识生产局限于学科内部，以理论突破和学术发表为主要目标，与实践应用脱节。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知识生产日益呈现出应用情境驱动和创新生态系统协同的新特征。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跃迁，要求知识生产必须紧密围绕产业真问题、市场真需求，在“科学—技术—工程—市场”转化链条中创造价值。这意味着，应用型高校必须突破象牙塔式的封闭研究，转向开放、协同、应用导向的知识生产新模式。



产教融合范式正经历从松散耦合到战略共生的迭代升级。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的鲜明特征与活力源泉。新质生产力所具有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及其依托的技术群、产业群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对产教融合的广度、深度和紧密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的“点对点”合作、短期实习等浅层模式已难以适应需要,必须向紧密互依的战略共生范式升级。这意味着,产教双方要从简单的资源互换,走向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深度嵌入与价值共创。

系统谋划应用型高校 转型发展路径

当前,受传统办学惯性及评价导向等因素制约,部分省属应用型高校存在“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推动应用型高校转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在“破局”“协同”“焕新”上下功夫、求实效。

定标破局:实施分类评价,引导科学定位。加快构建符合应用型高校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引导其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明确分类建设标准。建议研究制定应用型高校分类建设指导目录,根据服务面向和能力水平,区分为侧重技术原创与关键技术攻关的“应用研究型”,以及侧重技术应用与工艺优化的“应用技术型”,并结合不同办学基础,引导高校精准定位、错位发展、形成阵列。健全分类考核评价指标。将评价重点从“学术GDP”转向“实际贡献度”,突出考察地方发展贡献度、技术应用效度、人才培养契合度等。强化分类支持政策。建立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政策扶持的联动机制,对评价优良的应用型高校,在招生计划(尤其是产教融合专业)、推免名额、专业设置自主权、学位点授权、项目申报、经费投入等方面给予倾斜,形成“奖优促建”的鲜明



导向。

赋能协同：深化产教融合，破除协同壁垒。构建“政产学研金”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打通堵点，提升效能。搭建高能级协同平台。由省相关部门牵头，梳理全省产业园区布局与主导产业，推动应用型高校与园区、龙头企业“结对联姻”，支持共建一批集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概念验证中心，积极打造“高校研发、平台熟化、园区量产”的全链条转化模式。创新协同机制。面向产业真需求组织攻关，推广“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解题、园区答卷”的揭榜挂帅机制；着眼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探索“校企双聘”、“产业教授”等柔性引才机制；着眼激发教师参与动力，完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切实提高科研人员收益比例。在具备条件的高校和园区，积极试

点探索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改革。赋能高校自主权。扩大试点应用型高校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人才评价、成果处置等方面的自主权，允许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快速响应。在教师职称评审中，加大技术应用、成果转化、行业服务等指标的权重，同时鼓励高校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内部治理和资源配置模式。

焕新重塑：激发师生动能，夯实育人根本。师生是应用型高校转型主角，必须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改革教师评价机制，破除“五唯”倾向，建立突出实践能力、产业贡献和社会服务的应用型评聘标准。实施教师企业轮训、挂职制度，鼓励教师牵头企业攻关项目。设立“产业导师”特聘岗位，吸引行业精英参与教学与人才培养。重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紧密对接江苏“1650”产业体系，优化专业结构，打造



特色专业集群。深化课程改革，将行业标准、技术前沿、真实项目融入教学，大力推广项目式学习和案例教学。强化实践环节，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推行现代学徒制、订单班等协同育人模式，实现学习与岗位需求无缝对接。营造“学以致用”的校园文化。加强学生职业规划指导，鼓励学生参与科创竞赛与创业实践，激发学生内驱力。弘扬工匠精神与创新文化，营造崇尚实干、尊重创造、宽容失败、追求卓越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树立“为国家需要而学、为产业进步而创”的远大志向。

(来源：2026 年第 9 期《群众》)



闯出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的特色之路

井冈山大学党委书记 罗旭彪

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找准自身定位，既不盲目跟风顶尖高校的发展路径，又能抓住AI转型的战略机遇，闯出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作为扎根革命老区井冈山的地方高校，井冈山大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近日，在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举办期间，井冈山大学党委书记罗旭彪接受中国教育在线专访，围绕AI时代智慧教育建设、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逻辑以及未来人才培养布局等核心问题，分享了老区高校锚定应用型定位，以红色铸魂、AI赋能、产教融合闯出特色发展之路的实践思考。

问题一：应用型高校进入AI转型关键期，井冈山大学如何推进智慧化教育建设？

罗旭彪：当前人工智能正全面重塑高等教育生态，应用型本科高校推进智慧化教育，绝不能简单添置设备、堆砌数字资源，而是要以AI赋能办学全链条、以智慧教育锚定应用型育人本质，闯出贴合地方应用型高校发展的特色之路。我们坚信，AI赋能教

育，最终是为了更好育人、育更好的人。井冈山大学将从以下三个层面推进：

第一，锚定育人本位，坚守红色育人特色。坚守应用型人才培养核心目标，把AI作为教育教学“工具赋能者”而非育人主体，坚决避免技术泛化、重形式轻实效。依托红色育人特色，我们研发发布了“井冈星火智脑1.0”首个红色语料大模型，将数字技术与红色文化浸润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思想引领与智慧教学双向赋能，开创了红色育人数字化新范式。

第二，坚持“数据+场景”双轮驱动教学变革。我们制定了AI教育五年“三步走”战略，建成统一数据中台和AI能力中心，打破信息孤岛。在此基础上，推行项目式教学与AI深度融合：把企



业真实技术难题转化为课程任务，AI辅助智能组卷、智慧阅卷，实现“从知识记忆到能力解决”的转向。我们推行的无纸化智慧考试、预约制考试，不仅是形式创新，更是倒逼教学从“教为中心”转向“学为中心”。

第三，持续“治理智慧化”提升办学效能。AI转型期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管理逻辑的变革。井冈山大学通过深入实施“身份认证一个号、全校融合一张网、业务数据一个湖、师生办事一站式、信息反馈一点通”等教育数字化建设举措，已初步建成统一数据中台+AI能力中心的数据全链条服务平台，实现了AI赋能“精准教、个性学、安全管、智能评、高效服”五位一体协同发展。

问题二：请您阐述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法？

罗旭彪：新时代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质量发展，是顺应国

家高教分类发展、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坚守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应用型高校不是“降格办学”，而是特色办学、精准办学、有为办学。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根植于高教改革规律、区域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三大核心，主要有：

1. 分类办学逻辑：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发展是顶层设计核心导向，研究型高校聚焦科研创新，应用型高校立足地方性、应用型、职业性，错位发展、精准定位，摒弃盲目攀高同质化办学误区，坚守服务地方、赋能产业的办学初心。

2. 产教融合共生逻辑：产业升级倒逼人才培养转型，人才培养反哺产业发展，二者深度共生是应用型高校生存发展的核心逻辑，办学方向紧跟区域产业布局，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链，人才输出匹配岗位链。



3. 立德树人根本逻辑：高质量发展首要前提是育人质量，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融合地域红色文化、本土文化涵养学生品格，实现品德素养、专业能力、实践本领三位一体全面发展，这是应用型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

4. 区域协同联动逻辑：跨区域高教联动是新时代发展新趋势，赣苏津三省地域产业互补、高教资源互通，应用型高校打破地域办学壁垒，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鉴、人才互通，依托区域协同拓宽高质量发展空间。

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推进方法，在我们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

一是要加大机制创新，破资源之困，要推进人事、评价、薪酬、科研管理改革，实施联合引才、上门引才、政策引才、飞地引才四策引才，破解地方高校发展瓶颈。

二是要强化模式创新，破同

质化之局，要坚持特色发展、错位竞争，做强红色育人、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生态文旅等优势专业群，打造全国辨识度。

三是要推进治理创新，破体制之障，要完善学术治理、资源配置、评价激励体系，以高效能治理支撑高质量发展。

四是要不断开放创新，破边界之限，要积极对接江西“1269”行动计划，联动苏津优质资源，推进产教联合体、现代产业学院、跨省协同育人平台建设。

五是要锚定内涵提质，守双优之本，要进一步落实“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地方优秀”双优工程要求，以红色铸魂、AI赋能、产教融合、科创提质、校地共生等五个方面推动内涵跃升。

问题三：井冈山大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下一步有哪些谋划与思考？

罗旭彪：面向“十五五”，井冈山大学将锚定“区域高水平



应用研究型大学”办学目标，实施“三步走”战略，全面践行井大初心：扎根井冈、服务江西、面向全国、铸魂育人，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面升级。

第一，深化“红色铸魂+AI赋能”的育人特色。井冈山大学将继续用好红色资源这一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井冈山精神”与时代新人培养的深度融合。下一步，我们将推出升级“井冈星火智脑”大模型，让红色文化可感、可知、可交互。全面推进智慧考试评价，在AI赋能教育教学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

第二，构建“产业需求牵引、项目贯穿全程”的培养新体系。我们将进一步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广“微专业+产业班+订单班”组合模式。例如，已联合华大集团等龙头企业共建微专业，学生修读后可快速对接紧缺岗位。下一步计划：每个应用型专业至少与3家行业骨干企业建立“专业-

企业一对一”深度合作，将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课程教学资源素材。

第三，推进“校地共生、区域协同”的开放办学格局。应用型高校的未来在“城”里、在“群”中。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吉安各县市区的全域合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共生”，比如通过博士服务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站，实质性助力地方产业升级。同时，以赣苏津三省合作为契机，推动三地应用型高校在学生交换、学分互认、师资共享、产教融合标准互鉴等方面的深度合作。

第四，超前布局“人口变局下的质量保障体系”。面对出生人口下降带来的生源结构变化，应用型高校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精准培养”。我们将实施“一生一案”成长支持计划，利用AI大数据为每位学生画像，提供个性化的学业、就业、创业指



导。同时，加快国际化步伐，从简单的技能培训转向联合办学、标准输出，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现场工程师。

最后，我想说：作为扎根江西本土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井冈山大学始终坚守立足吉安、服务江西、面向全国办学定位，主动融入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大局，积极拥抱 AI 教育转型浪潮，深耕内涵建设、创新育人机制、深化区域协同。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加强与江苏、天津等国内外高校的交流协作，互鉴办学经验、共研育人路径，携手推动三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协同提质、同向前行，共同为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合力。

(来源：2026 年 6 月 2 日转载自 EOL 教育在线)



应用型高校“双优”工程背景下校企党建融合的时代要求与路径创新

巢湖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 许航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要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今年3月7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介绍，要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应用型高校“双优”工程建设，必将开启应用型

高校建设的崭新篇章。

对于应用型高校来说，“双优”工程是重大的政策机遇，使应用型高校在研究型高校“双一流”建设与技能型高校“双高计划”的夹缝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双优”发展分赛道。但同时也对应用型高校提出了新的使命要求，应用型高校必须从“学科逻辑”向“需求逻辑”来一场根本性范式转换，以办学能力优质证明其能力和本事，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来彰显其价值贡献。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在“双优”工程背景下，应用型高校的党建也须与时俱进，与企业党建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应用型高校校企党建融合的时代要求

“双优”工程“办学能力优质”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的两方面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有机整体，实践中主要涉及高校和企业两个主体。“双优”工程的实施和取得预期成效，校企深度合作是其关键，因此，

“双优”工程对校企党建合作也就提出新的要求，要由层次较浅的党建联建走向更深层次的党建融合。

目标定位上：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双优”工程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校企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因此，这就要求校企党建合作不能停留在形式上或选择项的层面上，而必须认识到校企双方是利益共同体，必须进一步提升合作的战略目标定位，切实担负起党建引领发展的重任。校企通过党建深度融合，真正让党组织成为协调双方、凝聚共识的“硬

约束”力量。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主要途径，在“双优”工程建设背景下，校企党建合作不再是辅助性、点缀式的活动共建，而应是嵌入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全链条的制度性安排与战略性支撑。

组织关系上：建设新型组织关系。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需要坚强的组织保障，实施“双优”工程，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无疑也必须强化校企党建合作，校企双方党组织关系建设要进一步组织化，建立正式化新型的校企党组织关系，互融互促，从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

合作内容上：深入校企业务流程。校企党建融合既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难题的关键。党组织的活动不应是独立的“政治任务”，而应融入



人才培养、技术攻关、生产实践等业务场景。校企党建融合，必须深入到人才共育、协同创新等核心业务流程，从而真正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

二、应用型高校校企党建融合存在的不足

以往不少应用型高校都积极开展与企业合作开展党建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与“双优”工程对应用型高校校企党建融合的新要求相比，整的来看，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校企党建合作组织较为松散。校企党建合作多数基本上还在联建的层面，党建联建存在高校到企业“签约—挂牌—合影—新闻”的单向化、程式化倾向。有的虽也签订了有关共建协议，但议事协调的合作机制不完善，联建协议中的“人才共育”“科研协同”“资源共享”等往往难以落地见效。

校企党建合作内容相对较窄。多数校企党建联建内容主要还是党建的政治理论方面，与事业发展结合不够，未能较好触及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核心业务链条，一定程度存在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现象。

校企党建合作形式较为单一。校企党建联建形式主要是“签约挂牌”“参观座谈”，以及政治理论方面的学习交流与辅导报告等，而且多数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企业开展党建合作，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

总之，就目前来看，校企党建合作未能较好融入双方的核心业务流程——高校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企业的“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校企党建合作的层次还比较浅，党建的引领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还是校企党建合作的目标还没有达成一致，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鉴



于“双优”工程对应用型高校校企党建融合的新要求与当前校企党建合作的现状，应用型高校亟须创新校企党建融合的路径，发挥校企党建的引领与保障作用。

三、应用型高校校企党建融合的路径创新

高校和企业虽然性质不同，但在人才与科研供需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一方面，应用型高校办学能力是否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否优秀，最终的评价主体是企业，需要得到行业企业的认可，另一方面，应用型高校办学能力是否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否优秀，也需要企业深度参与，担负应尽的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双优”工程背景下，应用型高校与企业双主体应加强党建合作，努力创新，由形式联建走向形神合一的深度融合。

组织创新：从“组织松散”到“正式组织”。要发挥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校企党建融合就必须进一步创新组织形式，由松散结对、临时性的合作关系，变为校企双方党组织批准、认可的正式组织合作关系。在实践中，一是成立党组织联盟，应用型高校可以与企业建立多层级的双向组织合作关系，如在学校层面，可以建立校企党建联盟，由应用型高校党委牵头，联合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的党组织，成立行业性党建联盟；在院系层面，围绕学科专业，与相应合作企业成立党建联盟。二是成立功能型党支部，如以具体任务为目标，成立功能型党支部，把党支部建在产业学院、联合科技攻关团队、卓越人才班以及订单班上。

机制创新：从“随机开展”到“制度保障”。为保障校企党建融合真正落地见效，校企双方必须建立一套正式的议事协调机制，形成“组织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研、成果共享”的制度化



安排,构建完善的决策、运行、评价、激励的全链条机制。一是健全校企双向沟通机制,建立校企党组织定期会商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合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二是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将校企党建互融成效纳入高校和企业党建考核与党建引领发展指标;三是强化保障激励机制,设立校企党建融合专项经费,对在党建融合中表现优秀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激发校企双方参与的动力。

内容创新:从“政治理论”到“业务融合”。“双优”工程本质是以优质办学支撑优质服务,以优质服务倒逼优质办学的良性循环,校企党建融合要聚焦这一良性循环,全面嵌入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培训、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全流程,推动专业共建、课程共研、师资共培、项目共攻、成果共享,真正以校企党建引领专业对接产业、教学对接生产、科研对接需求,形成党建和业务

互融互促的良性格局。

形式创新:从“走过场”到“走进场”。校企合作,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校企党建融合,必须紧扣这一关键,创新合作形式,由走过场式的形式合作,到走进场的实质性合作。一是育人共施,进一步深化“党建+协同育人”模式,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如结合标杆院系、样本支部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研制、实习就业基地建设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二是创新共促,进一步优化“党建+科技服务”平台,以党建引领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赋能产业升级和区域创新,如围绕企业关键技术难题、产业升级需求,组建党员科研团队,开展联合攻关、“揭榜挂帅”等。

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实施“双优”工程,本质是以制度供给引导、推动应用型高校深度转型,来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在



这一进程中，校企关系从“合作”走向“融合”将成为必然。党建引领是确保正确办学方向、凝聚协同力量、破解融合难题的根本保证，党建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价值生产”，校企通过党建深度融合，能有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教融合的育人优势、科教融汇的创新优势、社会服务的效能优势。校企党组织通过深度融合，能有效跨越校企组织边界、整合异质资源，构建“资源共享、价值共创、责任共担”的治理共同体，形成“双优”工程背景下新型的校企党建融合关系。

(来源:2026 年 5 月 8 日《安徽日报数字报》)



“双优”工程：应用型大学面对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 瞿振元

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蔺跟荣

摘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中的全新制度设计，与研究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职业教育的“新双高”计划共同构成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三大核心工程，旨在破解应用型高校长期存在的办学定位同质化、发展“夹心层困境”、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研究表明，“双优”工程是应用型大学内部办学质量与外部区域贡献的有机统一，分别表现出十大关键要素。推进“双优”工程建设，要明确办学定位，构建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建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深化地方多元合作平台建设，突出应用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完善“国家主导、省级主责、学校主体”的新型大学治理体系。

关键词：“双优”工程；应用型大学；分类发展；产教协同；高等教育强国

一、问题的提出

2026年3月7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怀进鹏部长明确表示，锚定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目标，持续

优化资源供给结构，将应用型大学的“双优”工程与研究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职业教育的“新双高”计划并列、共同构成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建设的三大核心工程。这一讲话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的要求，在落实落地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各类高校发展树立标杆样板，使得分类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双一流”建设瞄准世界顶尖水平，聚焦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双优”工程面向地方应用型高校，核心是解决办学定位同质化、发展“夹心



层困境”和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错配的问题，引导高校扎根地方办出特色。“新双高”计划聚焦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高技能人才，支撑制造业升级和技能型社会建设。

高等教育分类建设的三大核心工程中，“双一流”建设和“新双高”计划已经实施多年，取得显著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尽管还有不少事项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深化，但总体来说还是有基础的。“双优”工程是一项全新的教育工程，高校和社会普遍高度关注，因此有很多问题需要从一开始就加以明确，诸如建设对象、遴选条件、遴选主体、工作程序、建设原则、建设目标、考核要求、资金筹措、治理关系等。

我国应用型高校发展道路有别于传统研究型大学。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建地

方院校。这些院校在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探索以“地方性、应用型”为核心定位的办学之路，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进入国家政策驱动的阶段。“双优”工程的启动，意味着应用型高校建设完成十年转型发展，迈入提质创优的新发展阶段。

二、“双优”工程的战略意义

“双优”工程围绕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同质化、人才供给和社会需求错配等问题，旨在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国家队，有力带动其他应用型大学提高办学水平、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双优”工程的推出并非偶然，而是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深刻把握、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精准回应、对教育强国建设



战略系统谋划的集中体现，是引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举措，具有多重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看，“双优”工程是完善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存在“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和“求大、求全、求升格”的发展惯性，综合性大学成为众人心目中好大学的模板，大学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发展路径演变为围绕办学资源在单一赛道上开展零和博弈，难以满足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应用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中，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定位、以对接产业需求培养实践型技术型人才为核心目标、注重产教协同校企合作办学的高校类型。根据教育部公开信息，截至2025年6月20日，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共2919所，其中普通本科高校1365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432所。这意味着千所左右的普通本科高校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它们在资源配置、社会评价和政策导向上都基本以研究型大学为参照，改革受到体制束缚，发展遇到“夹心层”困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优秀”为标准，为数量庞大的应用型高校群体开辟了分类卓越的新路径，完善了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支“国家队”引领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格局，使得每一类高校都有了清晰的发展赛道和标杆样板，即研究型高校瞄准世界顶尖水平，聚焦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扎根地方、服务区域，解决人才供需错配问题；职业院校聚焦高技能人才培养，支撑制造业升级。这一格局的形成，使我国高等教育从“单一赛道竞争”转



向“多元功能协同”，为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看，“双优”工程是打通知识创新与产业应用的关键桥梁。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本质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既需要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也需要大量能够将技术应用到具体场景、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大学发挥着将学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功能。换言之，应用型大学聚焦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处于基础研究与产业落地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将科学原理通过技术化实现实践赋能，另一方面又将技术

经验通过理论化反哺认知升级。这种双向转化既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以知识求真理的学术理性追求，又和职业院校知识即工具的实用导向不同，形成独特的差异化发展范式。

“双优”工程是整合优质办学资源，以优质服务为服务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定位升维，引导应用型高校以支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人才，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要素，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三)从区域协调发展看，“双优”工程是高等教育更好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

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但区域之间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相对不足，在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下，易陷入越落后越没资源、越没资源越落后的困局。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核心



问题已从“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上学的需求”转向“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上适合的学，成为有用的人”。“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优秀”为评价标准，只要扎根地方、办出特色、服务有力，每一所应用型高校都有机会成为区域发展的引领者，为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差距，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深层矛盾提供了关键的教育支撑。

同时，“双优”工程有利于应用型高校充分发挥其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力军作用，鼓励应用型高校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围绕区域产业需求科学定位、调整专业设置、深化校企合作，构建起区域高素质应用型人力资本供给源，成为区域最贴近产业的创新高地。

三、“双优”工程的核心内涵

“双优”工程一经提出，便得到热烈响应。这说明努力做到

“优质办学、优秀服务”是应用型高校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广泛共识。“双优”并非两个孤立目标，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深刻的内涵。

(一)何谓“双优”

“双优”的本质要求是“优质办学”和“优秀服务”。优质办学指向办学条件、办学能力、办学效果等内部质量，优秀服务聚焦人才供给、科技创新、社会培训等外部贡献，二者相互支撑、辩证统一，形成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从内优到外秀的系统循环。因此，优质办学与优秀服务既是“双优”工程的遴选条件，也是动态监测评价的依据，更是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方向。

从根本上看，办学优质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作为应用型大学的一体两面，是应用型大学内部办学质量与外部区域贡献的有机统一。应用型高校的本质特征是应用性，优质办学和优



秀服务体现为在服务地方、对接产业中的不可替代性。同时,优质办学要求应用型大学在办学实践中深度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也需要显示出足够的区域开放性。优秀服务要求应用型大学成为对区域贡献的大学,当区域产生需要大学解决的问题时,应用型高校应主动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等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双优”的核心在于推动应用型大学将办学质量与区域服务能力深度耦合,实现办学逻辑从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转向以解决真实问题为导向的价值创造。“双优”还包含大学与区域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应用型大学的办学能力决定了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贡献,而服务贡献又反过来决定着区域对学校的支持力度。

(二) 谁是应用型高校?

“双优”工程的建设对象是应用型高校。谁是“应用型高校”?怎么确定“研究型”“应用型”的分类边界?这是需要明确的首要问题。

一般认为,应用型高校的使命就是坚持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以扎根地方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发展为导向,并以此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成果转化和应用,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早在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明确了我国高校应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将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作为高校分类框架。从分类操作层面看,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分类边界较为清晰,而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之间还存在重叠模糊地带。因此,“双优”工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尽快明晰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的分类边界,使那些“总体水平比



较高、但在研究型大学中水平不算高又不甘心当应用型高校”的高校尽早安心定位。

现实中，一个相对明确的分类标准是博士授权点的数量和博士生培养规模。作为研究型大学，必须具有一定的博士授权点数量和博士生培养规模。没有博士授予权的单位肯定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但是，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不一定是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同样可以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特别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此，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的区分，一方面要考虑博士授权点的数量与博士生培养规模，另一方面要跳出简单以指标筛选的传统思维和办法，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出发，在举办者与办学者的法定责任和权力关系中加以明确。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核心框架是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

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中央负责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和直属高校管理，省级政府主导区域内高校的布局调整、经费统筹和专业设置，同时高校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显然，省域内的公立高等教育的举办者是地方政府、其布局是省级政府的权力，也是省级政府的责任。因此，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固然与办学水平有关，但也不全是学校自身就能确定的，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运行的结果，其中省级政府对大学办学定位具有主导作用。民办高校的办学定位同样需要举办者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提出申请，由政府组织审核和批准。

（三）“双优”的特征

“双优”区别于以学术产出为核心的传统大学办学逻辑，体现出“内优外秀”的应用型高等教育显著特征。

一是类型的独立性。应用型高校的优秀不应体现在与研究型



大学在同一套标准中争排名，而在于服务地方、对接产业、支撑区域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双优”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低配，而是基于应用型高校区域贡献的独立体系。这种独立性确立了应用型高校区别于研究型大学和职业院校的根本，使得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分类卓越的理念走向实践。

二是价值的耦合性。“双优”将办学质量与区域贡献相统一，使内优与外秀形成双向互动，有利于打破高等教育内部发展与经济社会外部贡献相对脱离的弊端，体现出应用型高校“扎根地方、服务区域”的办学逻辑。也就是说，在“双优”的逻辑中，一所应用型高校如果仅仅是内部办学能力出众，而未能有效服务区域发展、作出相应贡献，其办学质量就仍存在短板，算不上全面优质。

三是结果的导向性。传统的评价往往以投入评价质量，逻辑

是只要投入充足，质量自然有保障。而“双优”突出质量、绩效、贡献，引导应用型高校评价从“做了什么”转向“贡献了什么”，从“投入导向”转向“产出导向”。实际上，应用型高校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培养的人才是否服务于区域发展，研发的技术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的服务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这种价值导向，为应用型高校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制度空间。

四是系统的协同性。“双优”工程不是孤立的项目工程，而是与“双一流”“新双高”共同构成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各司其职、协同进化的完整制度体系，推动高等教育从办学理念到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变革，构筑起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新格局。同时，这种系统协同性还体现在治理体系的联动上。中央政府出标准，省级政府统筹区域教育布局，学校主动争取发展条件，共同推动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四) 优质办学与优秀服务的 关键要素

在长期实践中,如何办好应用型高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达成了很多共识。优质办学表现出应用型高校内涵建设的系统性要求,优质服务体现了鲜明的结果导向。优质办学和优质服务可以分别概括为十个关键要素。这些关键要素,既是“双优”工程遴选的要素,也是动态监测评价的要素,还是应用型高校建设的基本考量。

1. “优质办学”的十大关键要素

优质办学涵盖办学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布局、科技创新、国际交流、治理体系、资源配置、毕业生发展和社会声誉等十个方面的关键要素。抓好这十个关键要素,就能够夯实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基本盘,摆脱“夹心层”困境,推进应用型高校的

高质量发展。

一是办学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根本政治保证。应用型高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使命,与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

二是高水平师资队伍。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应用型高校办学的关键。应用型高校的教师,既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应用型高校要积极推进师资队伍建设,重视应用型教师评价标准更新和优化,根据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将教学能力、实践能力、社会服务等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同时关注AI赋能教师成长。

三是人才培养质效。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职能,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培养为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应用型



高校办学质量的根本。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一方面要加强产教协同，重塑培养范式，融合产业规律与教育规律，推动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转变。另一方面要构建“需求—要素—质量”的反馈机制，根据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根据产业岗位能力要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动态适配。

四是学科战略布局。与国家 and 区域产业需求相匹配是应用型高校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终点。与研究型大学追求学科齐全、基础深厚不同，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聚焦区域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特色优势学科群。从资源依赖理论看，应用型高校的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于区域资源环境，其学科布局必须与区域产业结构深度耦合。因此应用型高校要摒弃“大

而全”的学科建设思路，走“特而强”的特色发展之路。

五是科技创新与社会贡献。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是衡量应用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标尺。应用型高校的科技创新不同于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更强调“应用导向”，其价值最终体现在能否解决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上。从创新价值链理论看，应用型高校处于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中间地带”，其核心功能是促进知识从学术场域向产业场域的流动与转化。应用型高校强调科技创新与社会贡献，有利于扭转了应用型高校“重论文轻转化”的科研导向。

六是国际交流。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是应用型高校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国际交流被视为研究型大学的“专利”，应用型高校在国际方面相对薄弱。然而，随着



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应用型高校要关注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的提升，不断拓宽国际化办学视野，同时应用型高校的国际交流应服务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需求，而非简单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路径。

七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完善依法治校机制、确保决策科学透明、行政服务高效是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在完善内部治理体系的同时加强外部治理体系，要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外部治理体系更显重要。同时，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需求，应用型高校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现代治理体系，完善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多方参与的共治格局，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决策机制。

八是资源配置与保障。组织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其行为逻辑

和发展路径。应用型高校的资源配置面临的核心矛盾是有限的经费投入与多元的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失衡。强化资源配置与保证，就是要引导应用型高校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将资源向教学一线、产教融合平台、实践教学环节倾斜，同时加强智慧校园建设，以数字化手段优化资源管理流程，赋能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校利用。

九是毕业生职业发展。毕业生就业质量、校友的贡献度、毕业生长期竞争力是衡量应用型高校办学成效核心指标，体现了从“入口”到“培养”再到“出口”的全链条质量观，是学校办学质量直接影响学校社会声誉和生源质量的表现。应用型高校要将毕业生职业发展、社会 and 用人单位的评价作为办学和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以优秀的人才培养质量吸引优质生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十是社会公信力与声誉。社



会公信力是大学的核心无形资产。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社会公信力主要来源于服务区域发展的实际贡献和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应用型高校要跳出传统学术评价的桎梏，建立质量和贡献导向的评价体系，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区域服务贡献能力，打造应用型特色教育品牌。

2. “优秀服务”的十大关键要素

应用型高校的优秀服务应该包含毕业生留用、技术合作、成果转化、平台共建、智库服务、社会培训、人才引育、产业支持度、资源开放、派驻专家等十个主要方面。

一是毕业生留用率。应届毕业生在学校所在地级市及省内就业的比例是衡量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水平最直接的指标，反映了高校人才培养与区域人才需求的适配程度，以及毕业生对区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高的毕业生

留用率意味着这所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区域发展需求的适配度较高。

二是共建平台数量。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共同组建的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及科技园数量是应用型高校实现产教融合的主要途径，其数量和质量反映了高校与区域产业合作的深度和稳定性。

三是技术合同数额。应用型高校要走出“重纵向轻横向”的误区，将服务地方企业技术发展需求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与纵向科研经费不同，横向经费和技术合同数额源于市场委托，其规模和增长反映了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认可高校的技术服务能力。

四是成果转化收益。成果转化收益不仅是经济指标，更是衡量高校与产业界知识耦合深度的核心指标。从知识转移理论看，大学的知识只有实现向产业界的有效转移，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应用型高校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体系，以服



务产业需求引领科研方向，打通从实验室到工厂的“最后一公里”，成为驱动区域经济社会进步的创新策源地。

五是社会培训人次。进入学习型社会，高校的社会培训和继续教育功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社会培训是与区域社会建立广泛联系的重要纽带。这就要求应用型高校拓展非学历教育，向社会各类群体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动能。

六是智库成果采纳。应用型高校扎根地方，对区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有着天然的研究优势。因此，应用型高校应将研究目光投向区域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实现从“学术研究”向“决策咨询”的功能拓展。

七是服务地方人才引育。高校是区域人才高地建设的核心载体。应用型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

不仅提升了自身办学水平，也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高端智力支持，体现了应用型高校在区域的人才中心地位。

八是专业产业支持度。学校专业设置对地方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程度，是衡量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结构适配性的主要方面。应用型高校要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及时优化专业布局，实现从“有什么教师开什么课”向“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根本转变。

九是资源开放频次。大学资源不应是封闭的校有资产，而应成为区域社会的公共财富。学校的图书馆、实验室要有序向社会开放。强调资源开放，就是要引导应用型高校拆除“围墙”，实现高校与区域的资源共建共享，服务社会、提高效益。

十是派驻专家人数。派驻专



家将高校的智力资源直接嵌入企业生产一线,实现从“坐而论道”向“起而行之”的服务模式转变,是产教融合从“机构合作”走向“人员融合”的体现。

3. 优质办学与优秀服务的转化与统一

综观上述二十个关键要素,优质办学与优秀服务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互为因果的逻辑整体。优质办学是优秀服务的基础,没有高素质师资队伍、科学的学科布局、完善的治理体系,就难以产生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和人才供给;优秀服务是优质办学的价值体现,毕业生留用率、技术合同成交额、成果转化收益等外部贡献指标,最终检验了办学质量的实际成效。

优质办学与优秀服务的二十个关键要素,体现了“双优”工程内外的统一性。一是“投入导向”与“产出导向”的统一,以区域需求配置优质资源,以产出

质量调整专业结构,以服务贡献检验办学成效。二是“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的统一,在内部质量评价的基础上,重视用人单位反馈、第三方评价等外部评价。三是“学术标准”与“应用标准”的统一,将评价标准聚焦于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能力,以技术攻关实效、工艺改进水平、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作为衡量学术深度与广度的新标准,实现学术与应用的同生共长。这三个统一,是应用型高校评价体系去“研究型大学依附”的关键所在,也是“双优”工程区别其他教育工程的根本特征。

四、当下“双优”工程建设应当抓好的重要事项

“双优”工程不可能通过对传统办学模式的修修补补来实现,必须进行系统性重塑。当下,在国家推进“双优”工程建设的起步时期,应该抓好以下重要事项,确保工程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和可



持续发展。

(一) 明确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位

办学定位是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旗帜和方向,具有统领引导作用,决定着学校的发展路径和资源配置。应用型高校要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按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方向,不断提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具体而言,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需要从四个维度实现深度契合。一是学科专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二是人才培养与区域行业产业人才需求契合,三是人才高地建设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契合,四是社会服务与区域文化和特色发展契合。这四个“契合”构成了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的基本框架,引导学校以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服务。

科学定位不能仅是学校规划

的文本表述,而是要切实将其贯彻落实到学科专业定位、人才培养定位、科研定位、社会服务定位中,改变某些地方高校“一边高喊建设‘应用型’,一边向研究型大学全面看齐”的“夹心层”困境。

(二) 构建全过程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核心。要构建全过程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将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学生学习与研究课题,将企业技术难题转化为教师科研选题。

“全过程”指产教协同贯穿从招生到就业的整个人才培养全周期。在招生环节,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选拔标准;在培养环节,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和质量评价;在就业环节,建立校企双向选择的对接机制。所谓“高协同”,是指学校与企业、课堂与车间、



学习与工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素质养成的有机统一。

应用型高校产教协同困境的根源在于产校企双方的利益诉求差异与制度供给的结构性错配,需要通过建构以需求为导向,校企利益共享、资源耦合、风险共担、人才共育的合作模式加以克服。现代产业学院是这一模式的重要探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习基地,也不是某一家企业的订单班,而是把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新组织形态。

(三) 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办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应用型高校要建立“双师双能型”教师认定与评价标准体系。

“双师双能型”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理论教学能力,又要具备丰富的实践指导能力;既能在课堂上讲授专业知识,又能在企业现

场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对艺术类、体育类、医药卫生类等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师应有不同的标准,不能“一刀切”。

健全校企协同的师资联合培养与互聘共享机制,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并参与实践,将企业实践经历纳入教师专业发展的刚性要求,并作为岗位聘用、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同时,设立“产业教授”岗位,从行业龙头企业选聘技术高管担任兼职教授,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教学和实践指导。

(四) 以多元合作平台深化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是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的直接体现,也是得到区域认可,获得办学资源的重要途径。合作平台是高校与区域合作的组织载体与制度中介。应用型高校与区域合作要建立多元化的合作平台,包括技术转移中心、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教师教育培训、



医疗卫生服务、农业科技小院、新型智库、地方研究院等多领域、多形态、可持续的合作平台，推动形成多领域覆盖、多主体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格局。

在科研组织方面，积极推行“揭榜挂帅”机制，承接委托项目，开放大型仪器设备。“揭榜挂帅”以产业实际问题为导向，打破传统的科研立项方式，更符合应用型高校的科研定位与发展逻辑。探索建构“政府征题、企业出题、高校接题、师生解题”组织方式，将企业技术需求转化为科研课题，既解决了企业实际问题，又为师生提供了真实的研究场景。同时，推动大型仪器设备共建共享，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在人才流动方面，鼓励教师深入行业企业担任技术顾问或“科技副总”，参与地方立法、规划或调研，聘请企业家、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教授，安排教师

到合作企业挂职锻炼。这种双向流动机制，有助于高校智力资源与产业实践需求的精准对接，是产教融合从“机构合作”走向“人员融合”的重要标志，也是应用型高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路径。

（五）加强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教育是应用型高校提升办学层次、增强服务能力的重要支撑。要着力加强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学位点建设，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区别于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更加突出实践导向和应用特色，形成差异化的培养定位。

在培养理念上，要避免简单模仿学术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防止弱化应用特色。坚持实践导向，不以论文发表为唯一评价标准，而应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对技术创新的贡献作为主



要评价依据。

在培养过程中，推动培养过程深度融入产业链，构建以实践成果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鼓励学生应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将项目成果、技术专利、解决方案等作为学位评定的重要依据。同时，要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推行“校内导师+企业导师”的双导师制，校企共建产教深度融合平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条件。

从国际经验看，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以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导向，学生带着企业项目入学，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培养模式，值得我国应用型高校借鉴。总之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应坚持“实践成果为核心”的评价理念，使培养过程深度嵌入产业链，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有机衔接。

(六) 构建新型治理体系：
理顺政校关系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当前，在国家推进“双优”工程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快建立中央、省市、学校之间的新型治理关系，对于系统提升应用型高校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要着力构建“国家主导、省级主责、学校主体”的三级联动治理模式，形成权责明晰、高效协同的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制定标准、完善政策、加大投入，为应用型高校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供给；省市统筹区域教育的布局，推动教育结构与产业发展布局、人口结构变化等协调发展，明晰高校的分类发展定位和目标，明确重点建设的支持政策等，切实履行统筹管理与监督职责；学校作为办学主体，明确自身在区域发展中的定位，主动争取发展有利条件，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五、结论与讨论



“双优”工程承载着破解高等教育“千校一面”困境、完善分类发展体系、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重使命。展望未来，“双优”工程的根本价值在于引导应用型高校在服务区域中提升办学水平，以高质量办学服务区域发展，最终实现分类卓越、特色发展，同时“双优”工程与“双一流”建设、“新双高”计划一起，共同构成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协同推进的战略布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来源：2026 年 7 月 15 日
人大教育学刊)



共生理论视域下产业工程师培养路径探索

孙娴、黄昭明、朱天宇、郑明东

摘要:为系统破解应用型高校产业工程师培养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本研究引入共生理论,构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共生环境”分析框架,以诊断政校企协同系统的核心困境,并以“三教改革”为内核驱动,系统重构培养路径。实践表明:通过构建三元共育治理共同体、革新“教师-教材-教法”共生模式、打造多维贯通共生界面及优化支撑生态,有效缓解了“产教两张皮”等结构性难题。该模式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产业工程师;共生理论;产教融合

一、引言

当前,我国产业升级对高素质工程师的需求与应用型高校供给质量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集中体现为人才能力结构与岗位胜任要求错位。需求侧,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需要具备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侧,产教协同不足与实践教学薄弱使培养质量难以匹配产业

需求,进而制约高质量发展。

生物学共生理论为解释上述供需失衡与协同不足提供了系统视角。其互利共赢导向与产教融合目标一致,其主体单元可对应政府、高校与企业等关键参与方,其关系类型可用于描述产教融合由偏利走向互利的演化过程。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概念类比,缺少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也缺乏与关键教改实践相衔接的实证检验。

随着教师、教材、教法改革(下文简称“三教”改革)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转型获得了可落地的制度抓手。据此,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构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的四维分析框架(共生单元指政府、高校与企业等关键主体;共生模式指偏利共生、互利共生等关系类型;共生界面指课程体系、实



践平台与师资等传导载体；共生环境指政策、市场、技术与文化等外部条件），用于诊断产教融合的系统性堵点；在实践层面以“三教”改革为核心驱动，依托案例开展培养路径系统重构，并形成理论构建、困境诊断、路径重构与成效验证的研究闭环。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设计

工程教育的范式变迁并非是孤立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深刻嵌入国家产业战略与全球竞争格局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应用型高校产业工程师培养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是其历史演进路径依赖与新时代发展需求之间张力的集中体现。系统梳理该演进脉络与时代动因，是精准诊断当前困境、构建未来路径的逻辑起点。

（一）范式变迁与时代叩问

产业工程师培养理念随工程教育改革由技术工具导向转向创新引擎导向，大体经历技能导向、能力导向与创新导向三个阶段。

技能导向阶段面向传统制造业规模化培养标准化技术人才，课程强调成熟工艺与规范操作，但对技术迭代响应偏慢，易出现供给滞后。能力导向阶段在新工科建设推动下由知识掌握转向能力胜任，更强调跨学科整合、系统思维与团队协作，以适应产业升级对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的要求。创新导向阶段进一步强调面向新兴领域的定义问题能力、前沿技术整合与原创开发素养，一些高校以卓越工程师学院等组织形态承接培养使命。三阶段演进表明，人才培养体系需要与产业生态协同升级，但理念更新与实践落地之间仍存在明显张力。

对地方应用型高校而言，这一张力集中表现为四重现实矛盾。其一是战略需求与供给质量不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区域产业升级需要具备创新素养的复合型工程师，但培养方案与真实技术场景衔接不足，师资工程实践能



力偏弱。其二是组织边界与协同深度不足。政校企合作顺畅度不足，高校的学术惯性与企业的效益导向难以对接，政府角色边界不清，使合作停留在浅层，落地机制与价值共创不足。其三是知识迭代速度与教学更新速度不一致。产业技术更新快于课程与教材迭代，企业前沿实践难以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其四是评价标准与价值认同不一致，重学术轻技术的评价取向与工程实践和创新导向存在偏差，削弱双师型队伍建设动力，也影响学生职业认同。

（二）核心概念关系界定与传导机理

为避免概念并列堆砌，本研究将共生理论、产教融合、“三教”改革与产业工程师培养界定为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层级传导链，其逻辑结构如图1所示。共生理论作为系统诊断框架，用于识别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为问题诊断与路径设计提供分析依据。产教融合处

于制度与目标层，通过共同体建设、政策工具与资源配置规则明确协同边界与价值目标。“三教”改革处于运行机制层，在教师、教材与教法三个维度把企业任务、岗位标准与评价要求嵌入培养全过程，打通要素流动通道，是共生界面最具可操作性的改造抓手。产业工程师培养处于结果层，以胜任力提升、证书与职称获取以及就业质量等作为可检验产出，并通过企业反馈与数据评价反向校准前述制度安排与教学机制。由此，“三教”改革构成传导枢纽，将产教融合的宏观规则转化为课程供给与评价流程，推动协同从机制上落地，并在培养结果上完成验证，从而形成诊断、重构与验证相衔接的闭环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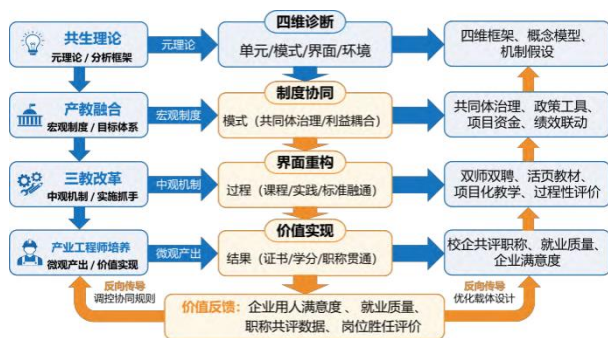


图1 共生理论贯通实践的层级传导链逻辑结构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

以皖江工学院产业工程师培养综合改革为典型案例,在共生理论指导下依次开展问题诊断、路径重构与成效评估。首先,通过梳理工程教育改革、新工科建设、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等政策文件与研究文献,提炼应用型高校产业工程师培养的目标要求与主要矛盾,据此构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的四维分析框架。其次,立足学校近年来试点改革实践,围绕政校企协同运行机制、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教师队伍建设与制度供给等关键环节,系统归纳四个维度的实践路径,形成与诊断结果相一致的重构思路。

研究对象以创新与产业工程师学院试点专业及学生群体为主,同时纳入相关专业教师与合作企业代表。数据来源包括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监测系统、政校企联席会议纪要、职业技能等级与职称

评价结果,以及对学生、教师和企业导师的问卷与访谈资料。近三届毕业生抽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300份。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与行动研究方法,并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对改革前后学生发展状况、协同育人体系运行成效与企业反馈进行纵向与横向对比,以检验路径重构的实际效果。

三、基于共生系统的培养困境 诊断与剖析

共生理论为产业工程师培养提供四维诊断框架。框架以政府、高校、企业与学生为共生单元,以偏利或互利为共生模式,以课程、平台与师资为共生界面,以政策与资源为共生环境,并按结构、关系、传导、保障的递进逻辑定位失衡堵点。“三教”改革是界面改造的关键枢纽,推动协同目标落到课程供给与能力产出。

共生单元联动失灵,突出表现为主体功能解耦与供需结构性



脱节。政府、高校与企业协同不足，主体功能难以互补，资源与能量循环效率偏低，进而导致人才供需脱节。供给侧的专业结构、课程体系与师资配置更新滞后，课程内容对前沿技术响应迟缓，教师工程实践能力不足。以冲压模具设计课程为例，教学仍以标准模型为主，而产业已广泛采用多工位自动线、激光料带与热冲压等工艺，对数字孪生与实时工艺优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需求侧的技术标准与岗位要求未能前置嵌入培养过程，政府在规则供给与资源配置上的角色边界也不够清晰，共建共享与责任共担机制难以稳定运行。

共生模式协同弱化，使关系由偏利共生走向互利共生面临明显壁垒。共生模式决定协同关系的稳定性与高级化，但当前政校企合作多停留在临时化、浅层化与不可持续的偏利共生状态。合作往往重签约轻运行，课程共建、

协同研发与深度实训等关键环节缺位，企业参与被压缩为提供岗位与举办活动，难以进入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与人才评价的全过程。由于缺乏常态沟通机制与稳定利益纽带，合作易在短期互动后停滞，系统内生动力不足，关系升级缺少持续牵引。

共生界面传导阻滞，使要素流动通道出现功能性中断。共生界面是知识、技术与资源在系统内传导的通道，但课程、平台与师资等关键界面存在阻滞，导致要素流动效率低下。课程更新缓慢，教师难以获取并转化企业真实案例与动态数据，教学内容与现场复杂问题脱节，学生所学难以直接转化为岗位胜任力。实训平台设备与场景滞后，企业项目与先进资源介入有限，校企共建易流于形式，实践训练与课堂内容重复。师资层面缺少稳定的双向流动机制，能力评估与反馈数



据也未形成闭环,进一步削弱界面传导功能。

共生环境支撑乏力,使制度、资源与文化生态呈现系统性薄弱。共生环境是系统运行的外部保障,但当前制度、资源与文化生态支撑不足。政策落实缺少细化规则、评估标准与有效激励,部分改革事项在地方推进中出现执行阻滞。资源投入方面,实践平台建设长期偏弱,企业因回报预期不稳定而参与谨慎,共建平台使用效率与持续投入能力不足。文化层面仍存在重学术轻技术的评价倾向,工程精神培育与职业荣誉激励不足,影响双师队伍建设积极性,也削弱学生职业认同与发展动力。

四、基于共生路径的实践模式 重构

皖江工学院以创新与产业工程师学院为载体,自2020年起系统重构产业工程师培养路径,围绕单元、模式、界面与环境四维干预推进协作升级,其中“三教”

改革作为界面改造枢纽,将协同目标落实到课程供给与能力产出,带动关系由偏利共生走向互利共生。

(一) 重塑共生单元,构建政校企三元共育治理共同体

为破解主体功能割裂的问题,改革首先重构各方角色与权责关系,推动形成治理共同体。政府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提供专项政策支持与跨部门协调。高校由单一育人执行主体转向资源集成与教学组织枢纽,统筹校企资源并推进教学创新。企业由实践场地提供者升级为共育主体,全程参与培养方案、课程开发、项目实施与能力评价。

依托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学校协同共建工程师学院,配套建立指导、专家、管理与职称评审等多元治理架构。政府每年提供50万元引导资金并制定产业工程师职称评审实施细则,将企业认证与项目成果纳



入评价体系。通过权责清单与年度联审联管机制，三方共同决策专业设置、课程更新与项目评估等事项。校内据此形成新的培养方案生成机制：企业提出岗位要求、政府备案审核、高校组织实施。这种三元主体的共治，为持续协同与稳定能量交换提供组织保障。

（二）革新共生模式，以“三教”改革为核心驱动互利关系升级

改革要实现由偏利共生走向互利共生，关键不在于扩大合作规模，而在于重建可持续的价值循环。“三教”改革位于共生界面层，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界面改造机制，其作用是把政校企协同目标转化为课程供给、项目运行与评价流程，使企业从外部支持者转为过程参与者，使高校从单向供给者转为共同生产者。改革初期，企业担忧技术遭到泄露与生产受到干扰，校内教师工程经

验不足，导致协同成本偏高。学校通过产教合作、知识产权共享协议明确成果归属，并以双师能力提升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入企实践与技术研修，稳定合作预期并降低进入门槛。

在运行机制上，学院以教师、教材与教法协同重构打通要素流动通道，并通过统一的课程标准与评价规则形成共育共评的闭环。教师改革面向双向流动，实施双师双聘与教师企业工作站机制，推动教师以访问工程师或技术顾问身份进入企业研发与工艺现场，同时引入企业工程师进入课堂与项目，形成双导师共同负责的教学与评价责任链。例如，派驻企业的教师曾深度参与某制件冲压模具设计工艺优化，使产品合格率提升约5%，并进一步促成校企联合申报纵向课题，实现从“人才共育”向“技术共创”的延伸。教材改革面向标准对接与快速迭代，校企共同把岗位任务、工艺



流程与质量标准转化为任务包与案例库，配套形成可更新的资源清单与版本管理机制，使教学资源能够跟随工艺迭代同步升级。教法改革面向能力生成与价值共创，围绕真实任务组织项目化学习，将认知训练、仿真实训、企业实训与岗位实习贯通为递进路径，推动学生在任务交付中形成问题定义、方案设计、过程控制与质量改进等关键能力。

为避免三项改革各自为政，学院将“三教”改革统一纳入项目管理与数据评价体系。课程运行以项目库为载体，评价以能力证据为依据，数据以协同平台为通道，企业对学生表现与岗位适配提出反馈，高校据此调整课程内容、任务难度与评价权重，形成持续迭代机制。由此，企业投入获得可见回报，高校供给获得现场校准，学生能力获得结果验证，“三教”改革由局部改良转化为驱动互利关系升级的核心引

擎。

(三) 畅通共生界面，打造平台、课程与数据多维贯通体系

在“三教”改革夯实微观界面后，进一步需要从系统层面打通要素流动通道，形成多维贯通的界面体系。平台界面方面，构建校内、校外与线上一体化实践平台。校内建成智能制造工程实训中心，总投资 1550 万元，设备与企业现场同步迭代，年均利用率保持在 80% 以上。校外与华孚精密科技、马钢等企业共建轮岗实训基地，保障实践教学的稳定与真实。线上自主开发工程训练与评估平台，支持远程项目模拟与故障诊断，并推动训练数据与企业评估数据互通，提升要素流动效率与反馈速度。

(四) 优化共生环境，构筑政策、治理与文化三位一体支撑生态

共生系统稳定运行需要外部环境支撑，实践从制度、组织与



文化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支撑生态。政策层面，落实省级学科专业结构改革部署并形成校本实施细则，建立学历学位、职业能力与职称的衔接机制，引导学生毕业前获得工程系列初级或中级职称，实现培养与用人制度对接。治理层面，多元委员会架构使政校企协同常态化，畅通诉求表达、保障利益平衡。文化层面，学校通过工程师荣誉展示、创新奖励与企业总工程师进校园等活动营造尊重实践与崇尚创新的氛围，增强学生职业认同与发展动力。

五、基于共生价值实现的 培养成效验证

为验证共生理论框架下产业工程师培养模式的实践效能，依托皖江工学院 2020 年以来的改革实践，围绕学生能力发展、协同运行效能与外部环境支撑进行综合评估。结果显示，该模式在人才供给质量、协同运行机制与制度环境支撑方面均取得可检验

改进，政校企互利共生格局初步形成。

(一) 共生单元能力提升， 学生工程实践与职业发展能力增强

改革后，学生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职业技能认证、岗位发展与企业满意度等指标上。2023 至 2024 学年，毕业生获得“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比例达到 95%以上，显著高于 2020 年（不足 20%）的水平。在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获得中级及以上证书比例达到 87.3%。对 2022 届部分毕业生追踪显示，入职三年内岗位晋升率超过一半，其中由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的比例为 55%。对 300 名毕业生抽样调查显示，超过 60%的受访者稳定就业于核心技术岗位，专业对口率达到 90%。企业反馈方面，华孚精密科技对近三届毕业生满意度由 2019 年的 75%提升至 2024 年的 95%，表明人才供给质



量得到需求侧认可。

(二) 共生模式效能显现，
资源共建与创新反哺机制形成

在协同运行层面，学院以“三教”改革推动企业任务、标准与评价进入培养过程，促使合作由浅层对接转向价值共创。教学资源共建方面，校企共同开发的 6 部场景化活页化教材已投入教学使用，其中涂装工艺学植入合作企业提供的 32 个典型缺陷案例与解决方案，实现企业经验的标准化转化。技术创新反哺方面，截至 2024 年底，校企合作期间共同申请专利 127 项，已授权发明专利 41 项，体现协同从人才共育向技术共创延伸。

(三) 共生环境优化验证，
制度保障与社会认可同步提升

在制度环境层面，学校出台产业工程师培养管理办法并建立学历学位、职业能力与职称的衔接机制，推动培养标准与用人制度对接。2023 至 2024 学年，已

有 530 名毕业生在离校前获得工程系列初级或中级职称，体现制度安排的可执行性与有效性。在社会认可层面，该模式获批安徽省产业工程师培养建设试点单位并牵头组建省级产教融合共同体，相关成果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2 项，学院团队获评 2021 至 2024 年度马鞍山市先进集体，说明改革获得外部认可并具备扩散基础。

六、结语

研究表明，共生理论为解析产教融合的复杂系统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视角。皖江工学院的改革实践显示，沿着单元重塑、模式革新、界面畅通与环境优化实施系统重构，能够推动政校企关系由偏利共生走向互利共生，并在人才供给质量与岗位胜任结果上形成可检验改进。研究的核心启示在于，产教融合的深化需要从项目式合作转向系统协同治理，其中“三教”改革是界面层面最具可操作性的枢纽机制，能



够把协同目标转化为课程供给与评价流程,进而驱动价值循环与关系升级。

在理论层面,本文将共生理论具体化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四维分析框架,丰富了产教融合与协同育人的研究工具。在实践层面,研究表明依托创新与产业工程师学院并以“三教”改革贯穿培养全过程,可以在地方应用型高校条件下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校企共育共创机制。在政策层面,学历学位、职业能力与职称的衔接机制以及多元委员会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产教融合推进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样本。

本研究以单一高校为案例,其不同区域与不同学科的适用性仍需进一步检验。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向深化。一是加强量化测度与效益评估,构建共生效应指标体系,推动价值创造由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验证。二是开展长

周期跟踪,分析合作不同阶段的利益协调、权责结构与信任机制演化,提炼共生术对共生系统的重塑作用,研究工业互联网、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孪生如何改造共生界面并带来新的治理议题。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育教学管理重大项目:应用型高校产业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23jxgl073);安徽省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改研究重点项目:基于共生理论驱动的产业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三教”改革研究(2024jyxm0572);皖江工学院新工科、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工科视域下高校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z1202434)。】

(来源:2026年5月18日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产教融合赋能普通本科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运行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龙飞扬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孙文远

摘要: 产教融合既是高校对接前沿技术、更新教学内容的快捷通道,也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最有效手段。产教融合顺应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逻辑,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赋予了产教融合新的时代内涵。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从师资互通、课程共建到平台载体共建、科研和社会服务共担,具有渐进式、多元化特征。然而,产教融合仍面临本科办学定位路径依赖、教学管理和组织僵化、管理和协调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文章从政策与制度保障、组织与协调保障、资源与平台保障、评价与监督保障等方面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 产教融合; 本科高校; 应用型人才; 高等教育

从当前社会和专业机构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来看,普通本科教育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基础理论和研究能力不如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而实践动手能力又不如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普通地方本科高校存在学科交叉渗透不足、实践

教学不完善、科教失衡、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本科人才的培养质量。由于重“学”轻“术”的思想桎梏,社会对“学术型”人才的认同度往往高于“技术型”人才,家长与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光环”更强的专业。在此观念导向下,高等教育的有限资源常倾向于投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在应用层面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进而导致培养的学生多为理论型人才,而非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相脱节。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人才供需结构的严重错位和失衡,“就业难”与“用工荒”矛盾愈



演愈烈，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产教融合可以拉近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距离，提高教育发展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加强人才培养与企业生产的融合度，培养能将理论联系实际，并将学科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直接为产业发展服务的应用型人才。产教融合是提升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最直接、最快速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应当成为专业建设顶层设计的内容，并将其贯穿于专业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本文从产教融合视角切入，探讨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困境和思路符合当前教育教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一、产教融合赋能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时代内涵

(一)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特色化发展的内在驱动

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新

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下文简称“四新”）建设，其核心就是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界融合，而产教融合是“四新”建设的天然实践场和核心驱动力。但是相当一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同质化竞争严重，缺乏办学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产教融合有助于对区域特色进行系统凝练，通过与区域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高校能够打造出特色专业集群，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办学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和内涵提升。此外，产教融合还可以增强本科院校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通过制定与地方产业相适应的产教融合实施方案，将人才培养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以提升高校对地方的贡献度，赢得更多社会资源和支持。

(二)应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有力举措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重塑所有行业。“中国制造 2025”“新质生产力”等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传统产业正在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高校如果不能快速响应，培养出满足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要求的人才，将无法承担起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在此宏观背景下，人才供给端所对应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科技竞争、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国际形势，迫使我国必须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需要大量能将创新成果落地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作为支撑。产教融合是高校对接前沿技术、更新教学内容的“快捷通道”。高校如果能够快速将这些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就能抢占未来人才培养高地。因此，产教融合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培养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必

由之路”。

(三) 弥补师生实践创新能力缺失的有效手段

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缺乏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应对真实工作场景的能力。即便有实验、实训环节，也多强调验证性和模拟性，与真实生产环境相去甚远。通过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开展项目式学习，推动教学从“知识灌输”向“能力生成”转变，重点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工艺创新能力和岗位迁移能力。这些真实场景的构建为学生提供了实战演练的机会，对学生来说这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创新思维、团队协作和职业素养的综合锻造。此外，高校教师虽学术功底扎实，但普遍缺乏产业一线的工作经验，难以有效指导学生实践工作。产教融合过程有助于快速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通过挂职锻炼、联合技术攻



关等方式,能够不断提升在岗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四) 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结构错位的必然之举

传统的本科教育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更新缓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瞬息万变的产业技术发展脱节,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学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通过行业企业深度参与,高校能基于需求导向精准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岗位能力要求,动态调整专业方向,使人才供给侧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侧。此外,校企协同能够将行业标准、职业资格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确保学生所学即为岗位所需,可以从根本上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产教融合赋能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运行模式分析

(一) 实现师资互通的融合模式

为了打通校企人才流通壁垒,高校与企业可合作构建师资互通

模式,建设“双师型”队伍。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实行双向流动,学生可以同时拥有校内学术导师和企业实践导师。高校聘请企业高管、技术骨干担任产业教授、兼职教师,承担课程、讲座、毕业设计的相关指导工作。高校教师定期到合作企业挂职锻炼、参与技术研发,不仅可以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实践教学能力,还可以为学生带来前沿的产业分析视角。

(二) 共同参与教学过程的融合模式

基于教学过程的融合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项目化”教学模式,即以“做项目”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实现“学中做、做中学”。项目主要来源于企业发布的小型技术难题、市场调研或研究计划等,教学过程是以企业的真实项目或模拟项目为基础,贯穿一门课程或一个学期。高校应先将传统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整



合和重构，然后融入相应的一个或多个完整的项目流程，最后学生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完成。校内导师负责理论指导和项目管理，企业导师负责技术可行性把关，极大地提升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的能力。另一种是“订单式”培养模式，即高校为企业“量身定制”人才，实现“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职”。校企签订人才联合培养协议，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在企业培养方案中嵌入企业特定文化和技能课程。从大二或大三学生中联合选拔，组建“订单培养班”，学生毕业后直接到合作企业就业。这种模式下，学生就业目标明确，学习动力足，而企业也获得了忠诚度高、适配性强的员工，实现了校企合作共赢。

(三) 共建平台载体的融合模式

基于平台载体的融合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共建实习实训基

地模式，这是最为普遍和基础的模式，侧重于强化教学环节的实践性。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真实生产环境，在校内共建实验室或生产性实训基地，打造学生实践平台。学生在企业园区或生产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完成毕业设计，打造校外实习基地。共建实训基地能够快速弥补高校实践教学资源的不足，让学生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生产过程。另一种是产业学院模式，这是目前最高阶、最深入的融合模式，旨在打造“利益共同体”。校企双方共建共管一个相对独立的育人实体产业学院，具有独立的组织架构（如理事会）、师资队伍、培养方案和经费保障。产业学院围绕产业链，设置与产业需求高度匹配的专业方向，企业工程师常驻学院授课，而高校教师参与企业研发。企业将真实项目、案例和培训课程植入教学计划，学生在合作企业的真实环境中完成



学习和实训，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定制化，解决了校企合作不稳定、不深入的问题。

(四) 实现科研合作与社会服务的融合模式

基于科研与服务的融合模式是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相结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融合模式，一般采用“产—学—研—用”一体化项目模式。这种模式以解决企业实际技术难题的横向课题或政府产学研项目为载体，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共同参与。校企联合成立技术中心，师生团队参与研发，研究成果在企业端被转化。学生的毕业设计课题可以直接来源于企业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实现毕业设计真题真做，实现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的同时，又直接服务于产业技术的进步。

三、产教融合赋能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 办学定位与评价体系

的路径依赖

当前，即便许多普通本科高校被定位成地方应用型大学，也仍存在着强烈的“学科导向”和“学术崇拜”惯性。评价教师主要依据其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获得的基金项目数量，评价学科主要看学术排名，导致学校的资源配置和荣誉体系都向学术研究倾斜，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在价值排序中逐渐被边缘化。一些高校虽然新增了一批与时俱进的前沿课程，但课程体系仍以学科理论为核心，缺乏与行业实践系统性融合的课程。虽然很多高校都提出了“应用型”转型规划，但办学理念、组织架构、管理制度等“软环境”并未同步转型，导致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实桎梏。

(二) 教学管理与组织的刚性约束

传统的固定学期制、班级授课制与产教融合所需的弹性学制、



项目化学习、长时间企业实践等模式产生了冲突。应用型人才往往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但高校内部的学院、专业壁垒使得跨学科的课程和项目难以组织、实施和推进。此外,财务制度的不灵活也会导致合作经费管理僵化,企业报酬支付、人员激励等难以满足企业运作,导致校企合作不畅。

(三) 宏观管理与协调机制的缺位和分割

在实际的运行中,教育、产业、人社等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不够,缺乏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跨部门协调机构,导致“政出多门”而责任分散。虽然国家提倡“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但具体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在地方层面落实不到位、力度不够,难以真正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此外,应用化转型和产教融合的成效,在本科教学评估、学科评估等关键评价体系中权重

不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指挥棒”效应。

(四) 企业参与动力不足,存在功利性动机

许多企业将参与产教融合视为成本而非投资,认为其投入人力、设备和资金的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往往缺乏战略眼光与耐心。企业更倾向于“收割”成熟人才,而非“播种”(培养未来人才),导致合作停留在提供实习岗位等浅层次层面。合作中产生的技术成果、专利等归属问题若事前没有清晰的协议约定,企业会因担心核心技术泄露而不敢深入合作。此外,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的安全责任、管理成本,也是企业的一大顾虑。

四、产教融合赋能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

(一) 完善政策与制度保障,为产教融合提供牵引力

第一,针对产教融合进行战略规划与立法保障。国家与地方



政府将“产教融合”置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核心战略位置，发布专项发展规划，明确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在校企合作中的权益，如知识产权和收益权等。第二，明确激励与约束机制。在税收优惠方面，对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实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或将其投入视为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在财政补贴方面，设立“产教融合专项基金”，对共建的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给予建设和运营补贴。在金融与土地支持方面，对产教融合项目提供低息贷款、优先保障用地等。此外，对企业实行“刚性”约束政策，比如将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成效，作为其申报政府类项目、享受其他政策扶持、评定荣誉称号的重要参考。第三，建立科学、透明

的认证与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认证标准，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专业认证。对达标企业进行认证和授牌，使其能便捷享受政策红利，形成“达标—受益—更深度参与”的良性循环。在人才培养标准对接方面，先推动行业制定职业能力等级标准，然后引导高校将这些标准内化为专业认证标准和毕业要求。

(二)健全组织与协调保障， 为产教融合构建连接器

第一，建立多部门协同治理机构。建议由教育、工信、发改、人社、科技等多部门组成产教融合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资源，共同出台政策，解决跨部门协调难题。此外，建立由校企双方共同参与的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实行“共同治理、共同决策”，确保双方利益和话语权。第二，发挥行业组织的连接作用。组织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与高校专家共同开发课程



标准和职业能力认证体系。组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会、博览会,为双方合作提供平台。定期组织行业内专家研讨出台《行业人才需求白皮书》和《技术发展路线图》,为高校专业调整和课程改革提供精准指引。

(三) 夯实资源与平台保障,为产教融合打造资源池

第一,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区域性、权威性的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人才需求、技术难题、科研成果、实习岗位、师资供需”等信息一站式发布与匹配。第二,打造共享型实践教学平台。政府主导建设公共实训基地,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由政府、园区、多所高校和企业共同投入,建设高水平的共享型实训基地和工程创新中心,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第三,设立项目纽带支持平台。以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项目”为载体,设立产教融合专项

基金项目或区域产教融合协同创新项目,设立引导校企联合申报,以项目为纽带促使双方在项目实战中实现深度融合。

(四) 优化评价与监督保障,为产教融合设立指挥棒

第一,建立绩效评价与监测体系。建立以“人才质量”和“产业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指标,重点关注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底薪、企业满意度、职业发展潜力,以及合作产生的技术成果转化数、解决产业问题数等。对认证的企业和合作项目进行定期考核,对不再符合标准或成效不佳的,取消其资格和相关优惠,在企业层面建立动态监测与退出机制。第二,强化培养质量评估与反馈。将产教融合深度和成效作为本科高校审核评估、专业认证、一流专业建设的关键指标,直接与招生计划、经费拨款等挂钩,形成对高校的硬约束。建立贯穿合作全过程的质量监控体系,定期收



集学生、教师、企业导师的反馈，并进行动态调整。第三，关注社会评价与舆论引导。发布产教融合年度发展报告，评选优秀案例，广泛宣传其价值和成果，营造重视产教融合的社会氛围，改变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

参考文献：略。

(来源：2026 年第 5 期《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崇德啟智

勵志博學

